

天神之后堂的「本堂神母」

—— 王美笑修女

(Sr. Michelle Reynolds, MM)

- | | |
|--------|------------------------|
| 1942 年 | 出生於美國麻省 |
| 1960 年 | 加入瑪利諾女修會 |
| 1968 年 | 在紐約唐人街服務 |
| 1970 年 | 宣發終身願 |
| 1972 年 | 獲修會派遣來香港 |
| 1974 年 | 派往復華村聖堂，成為首位平信徒擔任堂區管理人 |
| 1983 年 | 調派往新界區服務 |



(圖：王修女 2010 年慶祝入會金禧。圖片來源：瑪利諾女修會網站)

訪問、撰文：黃奕清

堂區是天主教教務轄區中的最小單位，堂區負責人一般是神父，稱為本堂神父或主任司鐸。王美笑修女卻成為香港首位管理一個堂區的平信徒，被教友笑稱為「本堂神母」。

七十年代來到香港的王修女，前期落戶觀塘，後來移居新界西，生活於社區當中，體驗其中的各種人和事，更曾經面對社區的拆遷，擔起守護堂區過渡至新社區的責任。

王修女生於美國麻省一個公教家庭，是家中的幼女，因為出世時體弱，恐怕不能生存下去，所以她是在醫院領洗的。王修女自小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直到中學最後的三年，她選擇轉讀天主教學校，為甚麼呢？

當時我已在想將來的生活，想著入修會。中學一畢業，我就加入瑪利諾修會，因為我最喜歡的，是想將我們的信仰跟其他的人一起分享。

中國文化初體驗

王修女 1960 年加入修會後繼續升學，及後被安排到紐約唐人街服務。除了堂區的工作，她也在華僑學校教書。

我們的堂區剛好在唐人街，很多教友未必是在唐人街住，在外面住，會特別在主日到唐人街參與彌撒，參與團體活動。

在美國我覺得最大的阻擋是語言方面，例如小朋友的家長，必須要有人做翻譯，在這方面我想做多一點。雖然我在美國上課，但我覺得吸收很少，環境不同，不是常常要用中文。

起初我沒想到來中國的，不過在唐人街接觸中國人，覺得他們的文化、語言好吸引，有很多地方想多了解和認識。

四年之後，修會安排我來香港，所以我 1972 年來到香港。

投入香港的社區生活

我在唐人街時很活躍的，又教書，又在堂區做牧民工作等等，（來港後）我特地安排了做一些義工。例如在聖德肋撒堂有中文彌撒，我會幫忙歌詠團。有些人找我，是護士團體，在廣華醫院、聖母醫院，有些醫院的服務。

不過最主要的是有一位神父邀請我，那地方現在沒有了，是復華村，現在是天神之后堂。因為他知道我喜歡小朋友和音樂，所以我起初在那裡幫忙歌詠團和小朋友的活動。我自己覺得，我不懂說他們的話，他們不會說英文，不過我們可以慢慢溝通。

在五十年代初期，東九龍地區與牛頭角一帶都是荒涼地方，當時香港政府用市區以外的這些郊區公地，臨時收容從大陸來港的難民。1952 年，瑪利諾會有計劃地安排在多個難民區展開傳教及援助工作，包括在復華村山頂處動工興建小學校舍與聖堂共用的建築物。該小學以時任教宗的名號，命名為「庇護十二學校」，聖堂最初名為「牛頭角天主教公所」，四度易名後稱為「天神之后小堂」。

當年的復華村位於今日牛頭角樂華邨一帶，依山而建，是瑪利諾神父在觀塘區傳教工作的起點，首次聚會的地方更是原來用來養豬的農舍。¹ 王修女憶述七十年代村內的環境，村裡的人雖然窮困，卻凝聚出密切的關係，也成了教會福傳的助力。

所有的屋是石屋，連在一起的，一行一行的，好像柴灣的石屋。有十區，每一區有幾排屋。

家裡沒水，要出去取水，沒廁所，要用公廁。我起初

¹ 見天神之后堂網站的歷史簡介：<https://bit.ly/2IQzjMt>。

到那裡，真的有些人是沒怎樣外出過。我記得小朋友，有些讀完小學，有些讀了一、兩年便停了，很多人沒繼續讀中學。後來在我們青年組，有些小學停了，自己讀晚上的夜校。

他們說以前，即是四、五十年代的時候，他們工作，不是給錢，而是給米他們吃的；他們自己合作起「屋仔」，會安排一間給他們每一家人。所以人們很團結，覺得這是自己建的村。我記得有很多人入教，在村內差不多有一萬人，有四分之一領了洗。有說教友的百分比是1%、2%、5%，不過在村裡面是四分之一，特別多。

星期六、日會打通小學的六個課室，做一間聖堂。有另外一間屋仔，是瑪利諾會的歷史，在四十年代時做麵的麵廠²，是當時的瑪利諾神父負責的地方。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捐牛油、麵粉等，人們不懂如何食用，所以教會做麵。不過到我的年代，它是堂區中心，用來做圖書館、上主日學等等。

王修女在 1973 年開始接觸復華村，初期一邊當義工，幫忙堂區的兒童歌詠團，一邊努力學習廣東話。

我覺得為甚麼我上堂聽的，與在村裡聽到的有不同？慢慢地我懂得看中文，原來這個是講台山話，這個是上海話，甚至有部分是講普通話，在村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方言。起初我覺得自己很蠢，聽不明，不過慢慢我知道是環境。

我的中文很「水皮」³，我聽到怎樣說，就會跟著怎

² 復華村的麵廠，樓高兩層。據英文版《1962 年香港天主教指南（重印）》記述，當時全港共有十二家教會開辦的食品製作中心，主要為麵廠，有三間還製作其他食品。

³ 廣東話，差勁的意思。

樣說，未必說得很準。因為這原因，在新亞書院，我的老師每一次上課，他都說：「妳去了哪裡？妳在哪兒聽這些話？」不過有個好處，我之後接觸他們，他們講甚麼話，我多少有點吸收，猜得到他們在說甚麼。

王修女要適應的，除了語境，還有與西方不同的生活與交際文化。

例如我們需要人幫手擺放椅子，我們會依賴輔祭會。他們的思想是，如果神父修女叫，他必須要做。我記得有幾次，他答應了做一些事又沒做，當然我會很生氣，為甚麼呢？後來，我覺得有些地方似乎是種禮貌，神父修女叫他做甚麼，他一定會答應，未必會做到，不過會答應，因為對他們來說，時常要「畀面」⁴。我說：「我要真話！真實的話！如果你不可以，不要跟我說你會來。」這些慢慢地，他們認識我，我認識他們。

另一樣是，有人請我們去「飲」⁵，有時我們會說很多俗話：「多謝了，不過那天我要返工。」別人說：「答應吧，妳可以跟他說妳會去。」「不過我不會去。」「不要緊的，妳答應，他會感到舒服一點，然後我們會通知他，修女剛好有點事，不能出席。」所以這是「畀面」，起初我很不習慣。

擔起堂區管理

完成廣東話課程後，王修女正式服務於復華村天神之后小堂。在那時代，堂區跟社區居民的關係相當密切，發生甚麼事，教友都會跟神父

⁴ 給面子的意思。

⁵ 宴會的意思。

和修女接觸。

尤其是我的時期，政府想收地，全部清拆，將居民搬去順利邨。所以我們跟明愛的社工合作，因為政府不會召集很多人開會，所以我們學校會當作家長會，我們會給他們返聖堂或者用學校，召集在一起。當時因為新屋的編排和申請，有很多人需要領洗紙作為住址證明，證明他們已經在那裡住了一段日子。

本來復華村有自己的聖堂，牛頭角有基督勞工堂在發展，有一位神父兼顧下面和上面，不過很多次時間有衝突，沒法子在兩個地方工作。瑪利諾神父請我搬來村內的聖堂，所以可以說我是香港第一個不是神父、但管理一間聖堂的人。

胡振中做主教，當時堂區交回給教區，我是復華村的管理人。胡振中說「無問題」，他都接受我做這份工作。之後其他團體都有試過，PIME Sisters（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修女）在新界區，有些堂區，有些 layperson（平信徒），那些 Scheut Fathers（聖母聖心會）都安排了。不過他們說我是第一個。

在 1978 至 80 年間，政府分階段清拆復華村，聖堂亦不能幸免，堂區過了一段既沒有牧職神父，又沒有彌撒中心的時期。

因為有一位瑪利諾神父在順利邨，在安置區有露宿者和長者服務，我們修女在那裡住，所以胡主教也邀請我在順利邨服務。有了住的地方，至於召集的地方，有時我們去餐廳開會，或在戶外的地方。

本來順利邨都屬於我們堂區的範圍，大部分復華村教友都搬去順利邨，他們要求我都跟著一起去。起初第一年，我們沒有地方，所以我都要去接觸，去找地方。幸好有一位教友有間幼稚園，願意借出地方，我們便可以在那裡舉行彌撒。

那個團體發展得很快，因為復華村拆了，很多教友搬去那裡，剛好竹園都拆了，有很多教友也搬去順利邨。當時有一位李神父（李若石神父）⁶在觀塘，帶我去介紹我給教友認識。所以我記得第一個聖誕節，有幾百人出現了，所以要在室外開彌撒。

由於王修女認識大部分復華村的教友，而李神父則認識竹園徙置區的大部分教友，所以她坦言，慶幸有李神父跟她合作，在這段過渡期內，堂區教友仍得以凝聚。在安逸幼稚園舉行的第一台子夜彌撒，原本預計有二百人出席，最後有五百人參加，要臨時加設座椅，彌撒並因此延遲了半個小時才開始，同時要把音量調低，免得被投訴。⁷

入鄉隨俗

順利天主教中學於 1983 年落成，從此成為天神之后彌撒中心的堂址，此時也有神父派來發展堂區，王修女逐離開市區，走進新界。王修

⁶ 李若石神父（1909-2005）出生於山西的教友家庭，1938 年晉鐸後服務於山西省。他於 1949 年來港，先後任調景嶺聖母升天小堂和沙田聖心堂助理司鐸。李神父在 1978 年於竹園平房區內的「聖庇護第十堂」任本堂神父，平房區清拆後，他從 1981 年起服務觀塘聖若翰堂。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李若石神父〉：<https://bit.ly/2VYo73O>。

⁷ 李慕娟著：〈與王美笑修女一席話〉。見於「2012 年天神之后堂六十周年尋根之旅」活動。

女先後在屯門和天水圍堂區服務，跟其他瑪利諾修女居於元朗洪水橋丹桂村內的玫瑰小堂。⁸

因為贖世主堂找人，我在修院裡面做 researching and planning（研究與計劃），有時為其他修女找工作、找地方。我到贖世主堂，在新界屯門，我很喜歡那環境，但修女們不想去。當時有一位神父說：「既然你喜歡，你自己去吧！」於是我說：「好吧，我去！」所以我之後一直在新界區。

在新界區，很多居民感覺這個地方是自己的地方，在九龍那邊是政府土地，起房子給人住，是住宅。在新界區有些住了很長的時間，有些村民跟我說：「妳知不知道，妳堂區和學校的地方，是我們的地方，我們要靠政府起學校，所以我們樂意犧牲自己的地方。」我感覺到，他們跟這地區有很密切的關係。

無論是教友非教友，都覺得這是「我們」的村，「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地方。因此我覺得工作時，有時要很小心，要尊重村長，凡事要先通知他。

我們都屬於街坊會，報名參加了丹桂村街坊會。以前我們無論是學校，都公開給他們借用地方，所以他們都知道我們關心這裡的情況，時常都會通知我們村裡在做甚麼。

有一次，這兒的村民，不知是否道教的，要在室外搭帳棚，想借用隔鄰的村公所。不過村公所剛好有事，沒開

⁸ 據聖伯多祿聖保祿堂的「堂區簡史」，五十年代主管元朗區的黃景賢神父在1955年於丹桂村租得兩間軍營式鐵皮半圓拱屋作為聖堂，名為「玫瑰小堂」。小堂於1964年易名為「玫瑰堂」，脫離元朗堂區，自成洪水橋堂區，至1995年納入天水圍聖葉理諾堂，並於2006年結束。

門，所以跟我們接觸，問可否借用地方。我們覺得沒問題，可以借，所以給他們用，因為當中有小朋友，我們讓他們可以進來休息。我們尊重他們的習俗，沒有問題。

以前在屯門，有位青年，因為交通意外去世，是上山土葬的。雖然他是教友，不過村民反對，不想神父一起上山祝聖他的墳墓。幾個月之後，舊的村長年紀大了，他過身了，他的全家是教友。他們都有他們的儀式，在室外搭了個帳篷，我記得他家人叫村民獻香，教友就點蠟燭。他們當時都要求我跟著上山，所以我有機會看到他們的習俗。

那位神父是中國人，不過可能第一次大部分人不是教友，而第二次大部分是教友。所以我知道，不可以只是自己想做甚麼就做，要慢慢看他們是否歡喜，是否接受，不想令人有不舒服。

這份尊重，亦體現於修會的社區服務，王修女舉例說：

在元朗明愛盈水閣（安老院），修女們很關心長者，亦尊重他們的習慣。我們每個星期有一次彌撒，不是主日，是在平日舉行的，為神父的方便。逢初一和十五，為道教或佛教徒會有特別的紀念。我們很多地方的修女，都會看有甚麼可以配合大家一起做。

今天已年過七十的王美笑修女活躍依舊，管理已「變身」為活動中心的洪水橋玫瑰小堂，在聖斯德望堂當牧職修女，也是三間學校的校董，還有修會的會務等等。問到將來想在美國還是香港退休，她答說：

老實說，我在這裡有四十多年，習慣香港的生活，如果可以留下來，多數會繼續。

尊重並敏於學生情感

—— 甘秀玲修女

1934 年	出生於香港
1954 至 55 年	在聖瑪利學校實習
1955 至 56 年	在培立學校實習
1956 年	加入善牧會
1962 年	在菲律賓宣發永願
1955 至 77 年	分別在培立學校、聖類斯夜校、瑪利灣學校服務
1977 至 82 年	擔任培立學校校長
1984 至 88 年	擔任瑪利灣學校校長
1989 至 94 年	於地利亞學校任教至退休



(圖：甘秀玲修女)

訪問：劉卓輝、范煒娟

撰文：劉卓輝、范煒娟、張小蘭

甘秀玲修女在師範學院畢業後就投身於教育工作，主要在培立學校任教。善牧會的神恩是照顧有困難的婦女。她們五十年代初開辦的培立學校，是一所天主教的特殊學校。雖然這家女校的學生有著各種各樣的背景，教育工作殊不容易，但逾半世紀以來，甘修女一直都沒有放棄按天主的心意，盡心教育，並按她們不同的需要及處境進行教化。

接觸修會的緣起

甘修女首次考慮修道生活是在中四那年，但最終選擇的卻不是自己母校的修會。

我開始觀察母校修女的生活，覺得這種生活方式好像頗適合我。但奇怪的是：內裡有一種很強烈的聲音告訴我，母校修會不會適合你的！而國籍修會我不考慮，因為性格的問題；觀察了很多修會，總覺得不適合自己，譬如服裝的問題，我很怕熱，某些修院戴頭紗已嚇怕我。

天主很奇妙，適合你的就叫你去。到師範第二年的時候，我母校的校長叫我回去。她說：「Louise，你就快畢業了，選定一個課室吧。」我說：「Sister，很對不起，我不會回來教。」第一年實習我去了聖瑪利，那一年很開心。

踏上教育之途

聖瑪利書院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創辦，甘修女實習的那一年有兩位學生也踏上修道之路，而她自己則加入了善牧會。

我做實習時，預備試一下在善牧會培立學校工作，但因為當時培立不是登記的學校，要問准教育署。所以第一年我在聖瑪利實習，還未完成之時，寫信去教育署問准，

而他們真的給我。我覺得可能真的是天主的意思，讓我去試試看培立是否適合我。

第一年教書真的很開心。我剛好是 Form 2A 的班主任。最值得安慰是那一年出了兩個聖召，一個是李永援修女，另一位是詹秀璉修女，兩位都是嘉諾撒會的。最好的回憶就是這事。

第二年我就來了培立，那時培立才剛剛開始，是一間特殊學校，不屬於教育署。我們主要希望幫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所以我們這個機構是屬於社會福利署的，不是教育署。完成了兩年實習後，我就加入修會，去了羅省那裡試一下修道生活。

踏入教育生涯後，甘修女曾在不同教會學校任教，主要教授英文、打字和宗教等科目。

初到貴境的善牧會

善牧會自 1933 年起在上海法租界服務，直至共產黨於 1949 年在中國取得政權，修會需要做去留的決定。當時 Anna Marie 修女去英國大使館辦事，有位領事說：「香港的社會服務部門在關心你們善牧修女會的事。」¹ 修會亦收到香港主教的邀請，最終於 1951 年轉移到香港服務。

好像是 Bishop Valtorta，恩理覺主教² 吧，邀請她們

¹ 〈善牧在上海的歷史〉，參「天主教善牧修女會」網頁：<https://bit.ly/2F59pC3>。

² 恩理覺主教 (Enrico Valtorta, 1883-1951) 生於意大利米蘭，1907 年來港傳教，1926 年 3 月獲委任為香港代牧區第四任宗座代牧，同年六月祝聖為主教。教會聖統制於 1946 年在中國建立，香港代牧區隨之而晉升為聖統制主教區，恩主教於 1948 年 10 月正式成為香港教區首任主教。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恩理覺主教〉：<https://bit.ly/2ULBDLV>。

來的。來到沒有地方住，住在鐵路旁邊的軍營³。有幾個修會對我們都很好，譬如瑪利諾、嘉諾撒的修會都很幫忙。當時有外國籍的修女，譬如美國、加拿大、法國和愛爾蘭都有。來到這裡，他們也要慢慢地學廣東話。

當時有三個上海的修女，我不肯定，總之是北方的修女，她們一齊來的。慢慢地有廣東的修女參與。

在起初的日子，她們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維持生計就更加困難。

是很辛苦的，她們起初來到之時。我記得院長每個星期要去乞食一次。是的，這個院長是德國美國籍的，身體直直的，會帶一個年輕女子跟著她，我也試過一次跟著她去。她目不斜視一直走，走到一個辦公室就給一封信，希望人家捐贈。當時她們很辛苦。

善牧會的施教理念

善牧會修女起初在一廢置鐵皮屋，為有情緒和家庭困難的女孩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其後於1956年在清水灣道現址創辦「培立中心」，並開設了實用科目。培立學校於1966年正式成立，甘修女任教時的「培立實用學校」乃隸屬社會福利署，於1969年才成為教育署登記的政府資助特殊學校。至2002年，修會把學校和中心營辦權移交香港明愛。⁴

培立起初不是真的以教育為主，教育是次的，我們是希望整個人會因材施教，因需要而施教，所以設施是極其簡陋的。譬如現在五十多年後，明愛培立，我們說是substandard，真的不合規格。但他們很好，他們暫時都是這樣。

³ 據《公教報》報道，當時位置約在現今紅磡火車站附近。見〈明愛培立成立四十周年見證善牧會與明愛服務貧苦精神〉，《公教報》，3449期。

⁴ 同上。

我們的工作是政府資助的。如果不是政府資助，根本是不能做到的，因為培育一個善牧會的學生，是極之昂貴，用納稅人的錢，但你看到成果是值得的。

雖然校方曾考慮把偏遠的學校能搬到外面，但與社署署長商量後，善牧會決定留在原地。

那署長說，這是他自己的理解：「為何你們的工作的成果是那麼好？部分的原因是在這樣的環境，這是一個治療的環境，在外面是很少找到的，這樣的環境學生適應了之後，得到老師悉心照顧。但若搬了出去，在一個「石屎」⁵的學校，若你們做得好，可以繼續；若做得不好，你們連住的地方也就沒有了。所以若你問我，我會勸你們留下來。」所以善牧會決定留下來，沒有搬走。我自己很欣賞這個環境。

現今的教育制度及行政工作經常成為社會焦點，而當年的甘修女已敢於放棄傳統考試，且不怕反對不合理的要求。

這裡做行政的問題，不像現在那麼繁複。需要做的就會做，但主要的時間都是放在學生身上，看看她們的進展，看看她們是否在改變中。我覺得這是更重要。我們會祖⁶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價值比全世界更高。所以在每個學生身上，我們看到，雖然學生有時很煩人，但她們都是天主所創造的，她們的價值都是與我和其他人一樣高。這是我們的格言。

⁵ 廣東話，水泥建築的意思。

⁶ 善牧會會祖聖于法西亞 (St. Mary Euphrasia Pelletier) 原屬聖母仁愛女修會，後於 1814 年創辦善牧會，仍以照顧有困難婦女為服務神恩。兩個修會於 2014 年獲教廷批准合併。見〈善牧會與母會合併 活出修和精神 修女感恩〉，《公教報》，2014 年 7 月 6 日。

那時我們還未登記為教署一部分，我們都有測驗。但為我來說，考試應該廢除。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忘了是何時，在瑪利灣，試過不需要考試，每個星期會測驗。但這事很難實行，因為同事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他們很難放棄這種事。他們沒法說出：「這是否真的可以呢？」你能放膽試，是ok的；如果不能放膽，便不成了。

又像有一次，教署發一張告示，叫我們每個月寄一份學生負面表現報告給他們。看了這個告示後，我在想這是否真的由教署發出呢？有沒有搞錯？我們教學生是希望她們從正面去改善自己。你要我將時間，用行政時間來數她們這個月偷了多少次東西、這個月關了多少個老師學生？很多項的。於是我寫信去教署，說我不明白這封信，我希望你豁免我做這無謂的事情，這種工作不是我們的主要工作。這工作，我不知是誰發起的，但我覺得我們是要盡量從正面方法來幫助學生，我不希望用那麼寶貴的時間做這種事，所以我們沒有做。奇怪的是，收到信之後又豁免了。

自己眼中的培立學生

培立的學生以十二至十六歲為主，全都是女生，每人背景都很不一樣。但修女們不計較她們的背景，只管幫助她們。

學生大多數都是來自社署，是轉介的。大多數是不聽話，無心向學，「群埋晒」⁷異性朋友。不單是這一類，有些是因為家庭問題。

⁷ 聯群結隊的意思。

通常社署要她們簽一張紙，表示她們願意留在這裡。寫是這樣寫，實際是逼著要來，也沒有辦法，未必想進來，但住了一段時間，與我們打好關係後，慢慢就 ok 了。所以這是一間特殊學校。特殊在哪一方面呢？就是入學沒有定時，離開也沒有定時，不像普通學校一樣。若到差不多時間她們要走，我們就會讓她們走。這會使得教學有困難，斷斷續續，剛開始了一個班，突然又來了新人。這些我們都要慢慢適應。

實務學科快上手

由於培立學校的宗旨是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實用科目讓她們離開後有一技之長，應付日後的生活。

那時，培立叫「培立實用學校」，因為那時還未屬於教署的，所以我們開了育嬰班、烹飪班，洗熨、裁縫等實用班，還有 hair dressing（理髮）。因為是實用中學，所以我們設計這些科目。湯漢主教的媽媽在這裡服務很久，教烹飪家政課，教得很好，學生對她很有印象。

這些實用的科目是很能幫到她們的。例如她們結婚後，育嬰班很能幫她們，因為生孩子以後，怎樣帶孩子呢？她們有些結婚後不用外出工作，只在家裡打理得妥妥當當，烹飪也不用求人，譬如裁縫、織毛衣，對她們都是有用的，因為我們要記得這些學生，通常出去是要工作，若不用工作便一定會在家裡打理家務。所以這通通都是實用的，所以現在想起，很多舊生的家庭，為甚麼那麼好？因為她們勤力和願意學。她們也很懷念以前在培立學的都用得著，不祇是讀書。

大部分學生都不喜歡讀書，對實用科目很快上手，但要學習傳統科目便顯得困難。

因為打字是機器，她們用心便可以了。她們打得很好，可能英文程度不是很棒，但打字打得好。當這些學生離開我們，她們去公進社（公教進行社），那裡有位西婦幫她們進聖心商科。因為她們的背景沒有人知道，等於一個學生入學一樣。三個學生一起進去，有些 Portuguese（葡萄牙籍）學生、其他學生，看到她們打字很棒，問她們哪裡學來的？她們就說：「我們有一位中國修女教我們。」「你們不是外國來的？」「不是。」但她們不信。她們的確打得很棒。她們還學了速記。

我們其中有一個出去到一間大公司工作，因為她懂速記。有修女教她們速記。這個學生極聰明，看過一次怎樣默寫那封信，便研究那封信，然後又第二封，其實所有商科的東西都是差不多一樣的。她做秘書做得極好。祇要懂得思考和研究，就幫助她很多，所以打字是很需要的科目，我猜等於現在不會電腦的話，你懂不懂也需要學。

另外一個例子，有兩個學生拼命求，「甘修女，學英文真的很難，能不能免我們學英文？」因為我們是特殊教育嘛，我說：「不是不可以，你不想讀，你常常在課室搞事也很麻煩。」因為有些學生麻煩，同學也麻煩，老師也會麻煩。我說：「不過，你要想清楚一點，你不要後悔。我可以給你特別的時間表，免你讀英文，但之後你可能會後悔，你會抱怨我。」她們說：「不會的，不會的。」

她們真的在瑪利灣讀書沒有上英文課。離開了學校，結婚生子，回來投訴。「哎呀，甘修女真衰呀，那時我們

真的給你很多麻煩，你就聽了我們，免了我們讀英文。我們現在不會教孩子。孩子問我讀一個字，我也不會。」我說：「當時跟你說過，你會後悔，這是你的選擇。現在沒關係，你有機會還可以讀，讓孩子知道媽媽也可以很勤力的，在這個年紀都會讀書。」我會想到這些例子，很好的回憶。

除了在培立，位於香港仔的瑪利灣學校和毗鄰的瑪利灣中心，均由善牧會創辦，提供學習和寄宿的地方。學校於 1968 年開辦，至今仍由善牧會管理。這些為有行為及家庭困難的兒童而開設的特殊學校，統稱「群育學校」，目前全港有八所，其中三所由天主教營辦。

學生的出路

善牧會營辦的既然是實用導向的學校，當然希望學生離開後能找到工作。不過，甘修女指出，這也要視乎她們的能力，而最重要是勤奮的態度。

她們大多數都在工廠打工。英文程度比較好的，我們很幸運，可以去公教進行社。那裡有位西婦，我忘了她的名字。因為學生不是一整班來的，例如來一個，來第二個，這位西婦很好，幫她們辦理手續去英國繼續讀書，通常是去做護士，起碼有三、四位，好成功，好成功。所以她們的出路要看她們的程度，英文程度好的，就ok。其他大多數都在工廠，要挨活，沒有辦法的，但最重要是她們能勤力做事。

怎麼說呢？天主沒有給每個人讀書的能力。瑪利灣有個學生創意極高，完全不喜歡讀書，離開我們之後，跟人做生意失敗了，便到一家三級酒店做女傭工。一邊做，一邊跟一個師傅學魔術，現在做了專業魔術師，幫到很多

人。她回來瑪利灣開班，她說不一定要讀書，因為你真的沒有這個傾向、那種嗜好去讀書，但最重要是工作。她創意極高，非常好，我們看到都很開心，因為她令到很多人開心。

信仰的培育

跟現在處處以學科為重的教育風氣不同，當年培立的學生都要接受天主教信仰，作為一種體驗。

當時學生喜不喜歡也好，一大早一定要去望彌撒，沒得選擇。那你問我，現在回憶起來，這個宗教活動是怎樣呢？因為那時代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我覺得那是一個 exposure（體驗），讓她們知道天主的存在和我們的宗旨是甚麼。我們的宗旨是，希望她們有一天也得到信德。有很多學生，我們住在這裡之時，也做了教友，通常在鑽石山由雷志遠神父⁸幫她們洗禮。有很多也不信。我覺得，若這是天主教的機構，我們這樣做是沒錯的，是 ok 的，是一種培育，慢慢地她們自己會回想：「我是不是需要這些宗教呢？」是自由選擇。

我猜她們大多是被動式，即學校有這樣的活動，她們便參加，沒有異議。也沒有人很惡意批評，完全沒有。我印象中沒有一個學生問過：「我可不可以不去？」所以不管天氣多冷，她們都去，都要起床。

⁸ 雷志遠神父 (Luciano Aletta · 1910-2000) · 宗座外方傳教會士 · 1934 年來華。鑽石山聖則濟利亞堂 (原聖家小堂) 於 1952 年成立後的首位主任司鐸。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雷志遠神父〉：<https://bit.ly/2UQ9T8W>。

每個人都是天主獨一無二的子女

善牧會會祖聖于法西亞說：「一個人的價值比全世界更高」。這句話對甘修女的教育工作有很深影響。

我覺得這個座右銘對我們的工作很重要。例如我們的會祖聖于法西亞已經很強烈吩咐我們，永遠、永遠不可以打學生。有時她們激怒你，或會打她們一巴掌，從人性這方面很容易做出來，但我們要記得為何會祖有這樣的吩咐，因為我們要尊重對方。你打了她一巴掌，有些人會很記得。

除了與學生建立好的關係，讓她們感到被人尊重、不被看貶，甘修女認為學生對自己過往經歷的敏感度，教育者也必須要掌握。

每個學生的敏感度，你要知道。例如她真的不想人家知道她是從我們這裡出來，我們絕對不會洩露，絕對不會。如果她是無所謂的，那就無所謂。

所有學生不論任何國籍、任何社會，都可以教導到的。祇不過，你真的要接納這個學生，不是因為那時是五十年代，現在是2014年，是沒有分別的。例如現在有學生來這裡，她不被歧視，她被人接納，你很忍耐地對她，都是ok的，沒有問題。我覺得那基本態度是一定要有的。若沒有這基本態度、接納和寬恕，很難做這種工作的。譬如一個職員脾氣很差，很容易發怒。這種職員可能就不適合在這裡服務。能在這裡持續服務的，一定要愛這群學生。疼愛不是姑息，而是真的讓她們感受到這個老師對我是接納和尊重的，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分別的，時代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為聾童教育盡心盡力

——詹秀璉修女

1941 年	出生於香港
1956 年	領洗
1962 年	加入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1970 年	宣發終身願
1969 至 1973 年	在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任教
1973 至 2001 年	管理嘉諾撒達言學校
2001 年至今	支援修會內部教育事工及檔案室工作



(圖：詹秀璉修女)

訪問：劉卓輝、曾家洛

撰文：劉卓輝、曾家洛、張小蘭

在十九世紀初 1808 年起源於意大利北部韋羅那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首批六位修女於 1860 年抵港後，便投身於福傳和福利事業，提供醫療、教育等服務給貧苦大眾。非天主教家庭出身的詹秀璉修女自小在嘉諾撒仁愛會的學校讀書，受到修女們的感染及學校教育的影響，自然而然地選擇加入這個國際修會，並像前人一樣，扛起特殊教育這艱巨工作，為有需要的人服務。

渴望認識比父親更好的天父

我出生於一個非公教家庭，中四那年領洗。有幸也感謝我母親帶我去家裡附近的天主教學校讀書，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我的信仰。我記得小學三年級還是五年級的時候，有位修女上《聖經》課。她是位老人家，有一天她講了一句話，我仍然記得。她說：「我們的天父很好的，比我們家裡的爸爸還要好。」

我爸爸是很好的，我很仰慕他，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樂意助人的人，很愛惜家人，以及當認識的人有困難，他都會盡量幫助。我覺得我爸爸很好，那麼天父比我爸爸還要好，我覺得「嘩，這個天父那麼好」，心裡很想認識關於這個天父。這個心願一直影響我一生，甚至到現在我做事的目標和我的決定。我希望多些人認識那麼好的天父，因為很多人都會遇到困難和痛苦，面對挫折，但若我們真的認識和明白這麼好的天父之時，我們有很多痛苦都會更容易接受，容易跳出來重新再來。

嘉諾撒修會教育的影響

詹修女入讀的小學，正是嘉諾撒仁愛會開辦的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我一年級就在一間天主教的嘉諾撒學校讀書，自小修女就教我們要關心弱勢社群，不要小看貧窮的同學。我記得有一次去旅行，是去牛池灣安貧小姊妹修女辦的安老院，現在搬到上水的那一間，每個人都要帶兩罐罐頭或是一包米，捐給安老院的院友。我們從小開始學習要關心其他人，不可只顧著自己，要記得身邊有很多人都是有需要的。

到了中學的時候，我們當時讀書是要交學費的，很多人都沒錢讀書，要在家裡幫忙做家務，或做一些輕工業。那些失學的小朋友，我們有幾間嘉諾撒中學都有三點半的義學，是給他們免費來讀書的。當時，我忘了是中三還是中四，老師問我想不想當小老師。我一個星期兩次輪流與同學放學之後去教。這些學生可能都跟我差不多年齡，雖然自己沒有很大的信心，但既然他們有這樣的需要，就算我不是老師我不會教書，我有甚麼也可以分享，我想這也是影響到我。

當了修女後，我在一間正規小學任教時，我記得很清楚，有些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沒得吃，校長修女會在小息時，擺放一些食物、一些三文治，用幾個盒裝著。在開學時便預先告訴家長：告訴你的女兒，每天小息到某個地方有張枱。其實是在食物部旁邊，沒有太多人看到，去叫她自己去拿食物。當時我很欣賞。為甚麼不叫她們到校務處去拿食物呢？原來修女解釋，是要尊重她們，因為她們也有自尊，不要令她們在同學面前難受，這為我也是一個學習。

我也記得有一位意大利修女，因為知道我們哪些學生

比較窮困，哪一位家裡有很多小朋友的媽媽，有時有人捐來一些衣物，甚至一些米、食物、餅，她便會請那位媽媽來，不是在上課時間來學校，而是去修會那邊拿。要是她們願意，便請她們定時來，給她們這些東西。

教學生涯的開始

詹修女開始特殊教育之前，於 1969 至 73 年間在灣仔嘉諾撒聖方濟各小學任教。當時學校已安排學生接觸修會在毗鄰開辦的嘉諾撒啟明學校的視障學生。

當時當然沒有現在那麼多設施，亦未有免費教育。但在那一區，我們因為有百多年歷史，所以在區內有很多學生，甚至有從北角過來的。學生比較純品容易教。我在那裡教了四年，在小學部專責教上午班和下午班的聖經科，同時兼教中學部一班的聖經科，即宗教教育，亦兼中學部的聖母軍一個支團。¹

因為這樣，我可以請到中學的聖母軍學生，她們每個星期除了開會，還要做一個小時的工作。所以我可以很容易邀請到聖母軍團員去小學部，幫那些比較有需要的學生義務補習。所以覺得當時學校氣氛，中學小學好像一家人。

學生很多都是住在灣仔區，有很多草根階層，但亦有一些來自堅尼地道環境比較好的，但我發覺同學間沒有人會問家裡是怎樣的？大家很融洽，沒有階級觀念。另外，可能我們是在聖佛蘭士街山下，學校是被兩條街道包圍，

¹ 聖母軍源於愛爾蘭都柏林，其組織架構仿倣軍隊，最小單位是支團，幾個支團可組成區團，一個教區內的區團可組成督察區團。

住聖佛蘭士街那裡的人是經濟比較困難的，而上面是堅尼地道。聖佛蘭士街那裡有啟明學校，是為視覺障礙的同學而設。我們的中學生，除了聖母軍，還有其它學生都會接觸到失明的小朋友，會來跟他們玩，幫他們讀凸字，因為他們需要靠凸字學習，所以都學習到怎樣關懷弱小的小朋友。

聖佛蘭士街 (St. Francis Street) 可說是十九世紀灣仔區天主教會的中心地帶，附近的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當年是一條教友村，從其中英文名稱都盡顯天主教色彩。嘉諾撒仁愛會的多項服務也是環繞這一區域，其中聖方濟各醫院於 1959 年與重建後的嘉諾撒醫院合併遷離，空置院舍用作盲女院 (1968 年更名為嘉諾撒啟明學校)。

教學路的轉向

至於香港的聾童教育，最早可追溯至 1935 年由英國聖公會成立的真鐸啟暗學校。² 隨著時間推移，政府認為聾童也需要更多的正規教育，因此邀請嘉諾撒仁愛會承辦一間特殊學校，詹修女於 1973 年獲調派去管理修會第一所為聽障兒童開辦的新學校，即位於啟明學校旁的嘉諾撒達言學校，兩校同位於聖方濟各醫院舊址內。

這間聾童學校是當時香港第四間。因為早期沒有普及教育，讀書是要交學費的，政府亦沒有津貼學校，到了六十年代，政府才開始正式有特殊教育的資助。所以很多聽障兒童起初是沒有機會讀書，社會福利署便開設了一些聾童會，朝九晚五，在幾個區，特別是新界，照顧這些聽覺

² 施婉萍、路駿怡等：〈香港早期聾人教育與香港手語源流的關係〉，見《教育學報》，2011 年，第 39 卷第 1-2 期，頁 139-156。

有障礙的小朋友，讓他們在那裡學一些語文、數學，以及參加一些活動。

校舍落成之後，政府就請社會福利署把香港、九龍、新界各區所有聾童會的名單和聯絡地址，有哪些適齡入學的學生，全部給我們。其中有些來自官塘、西環、甚至很多是新界的荃灣、油柑頭、屯門、藍地、元朗、大埔、上水、沙頭角。很多新界的小朋友家裡是務農種菜的，很多是來自那些地方。

當時我們拿著名單，要說服一些家長讓孩子來讀書，所以我們設有宿舍，一方面是路途遙遠；另一方面是很多家庭都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他們需要這些小朋友幫他們種菜、收割和做家務，所以不想讓小朋友到我們灣仔來讀書，即使我們有宿舍。

還有若干人是漁民，來自長洲、坪洲、香港仔，有些歲數比較大，有些比較小，也就是家庭背景很參差，大部分環境不是很好，經濟不好，有飯吃為他們已是非常之好；甚至有澳門搭船過來的小朋友，住在親戚家裡，周末才回家。祇有兩、三個是比較有錢的。

達言學校的發展

開校初期，因校舍設施還未完善，但學生早已註冊了，唯有借用啟明學校的禮堂做臨時課室。

用兩塊屏風分開好像兩個班一樣。我們學生人數要很少，因為老師最多能照顧十位學生。我們把二十個學生分兩組，在禮堂用屏風隔著。直至第二年四月我們才搬上

去，那時由兩班加到四班，跟著九月便開始正式增加班級數目。

學校由一年級逐年開辦新班，在學生小學畢業前，校方爭取開辦中學部。中學部學生除了小學部畢業生，也有來自銅鑼灣中華基督教會啟聲學校的小六畢業生。

到了中三，我們又想開辦中四。若中三畢業出來，他們的前景不是很樂觀，所以我們想他們繼續升上去，於是又跟政府再爭取，但很難。

政府不支持開設中三以上的課程，幸而得到真鐸學校、路德會啟聾學校和啟聲學校三間特殊學校，以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的支持，才成功開辦中四和中五。這幾間學校亦參與社聯組織的聾人協調委員會，大家一起商討不同年齡層的聽障人士的設施和需要，或是他們的前景，以推動政府的政策。

可幸，自七十年代初學校開始的那幾年，直到八、九十年代，特殊教育的发展很快，有更多學校和康復機構的出現。

我最想補充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大家都有聽說過方心讓醫生和她的妹妹方心淑校長，他們在香港，甚至我們國內地的康復與教育方面，付出了很多。所以在那段時間，藉著方校長成立了特殊教育議會。每一種類的特殊學校都派兩個代表，經常開會去討論香港特殊教育政策，推薦給政府考慮，大家都很齊心去爭取政策改變，所以在那段時間，特殊教育發展得很好。

達言的師生們

達言的學生男女比例差別不大，男生稍微多一些。至於教學方面，學校盡量跟隨政府訂定的課程；而師生比例跟正規學校相比，是一點

三，最初的兩班有三位老師。

我們相信他們有能力，不過程度淺一些，外面有甚麼科目，我們也照樣跟著。當然我們不會有音樂，到後來才有。還有體育、美勞、中英數。英文初期是沒有的，過了幾年，我們開始試教英文。大致上是跟政府的課程，因為他們將來可以上（主流學校），能夠的，雖然慢一些；這也讓他們容易一點融入社會。

我們是在《公教報》招聘老師，因為我們想，教這些小朋友比較艱難，為我們也是一個新嘗試，我們認為找教友，或者大家可以有同一目標，比較容易去解釋給老師聽。這是困難的啊！不過我們為了支持天主教教育，所以我們在《公教報》刊登廣告，有幾位寫信來，不是很多。因為我們的校名沒有標明是特殊學校，有些不知道的也前來應徵，知道後就害怕說：「我不能夠勝任，對不起。」但我們都能聘請到老師，很幸運，真的找到幾位是教友，還有一、兩位是我們嘉諾撒會的舊生。

達言的宿舍和教學

達言學校一開始便提供宿舍，讓住在偏遠地方的學生可以入住，而居於附近才走讀。不過，校方會堅持每周送學生回家，免得親子關係疏離。

我們每星期五下午放學後有校車和工作人員送他們回家，我起初一、兩年也跟車，走一轉是三個小時，校車才能回到校舍。我們由灣仔出發，經荃灣，有些學生是住在荃灣的，一直到屯門、藍地、元朗，跟著到大埔、粉嶺，甚至上水。

寄宿的時間是星期一至五。我們鼓勵家人周末一定接回家。有些會說：「我們沒有空到村口去接，讓他們住在學校吧。」但我們堅持學生需要家庭生活，否則慢慢地他們不會喜歡回家，與家人的關係會疏離。我們堅持這樣，我們盡量避免他們拋棄小朋友。

在七十年代的八所聾童教育機構中，達言是少數沒有採用手語的學校，並且堅持以高質素助聽器輔助學生。

我們學校不是教手語的，用外國引入的一些教學方式，好的助聽機效果非常好，是貴了一點，但我們用這些教他們聽，他們聽到便會講。

只戴好的助聽器是不夠的，最重要是教學方法。我們很幸運，在八十年代開始引入聽講教學法。聽講教學法不是你讀完便可以，要配一些高質素助聽機。要懂得如何配合助聽機，小朋友佩戴後不會覺得很煩，因為配得不好，或助聽機質素不好，便會有沙沙的聲音。

我們首先是在每個教室買一套，他們放學後沒得聽，沒有延續，在學校學到的那一點點說話，若回去沒有練習便等於零。所以我們會鼓勵政府配一些好的助聽機。政府投標通常是採用最平宜的，但就是最平宜的質量令他們不喜歡戴。後來幾個團體、幾間學校一起要求政府重視這個問題，不斷跟政府爭取資源，就好很多了。現在基本上每人配兩部機，大部分都需要兩部。後來我們幾個團體也爭取政府在香港大學開設語言及聽覺科學部，現在那裡產生了很多聽覺治療師。

我們的信念是這樣的。國際的統計出來，差不多沒有人是完全聾的，每個人都有一些剩餘的聽覺能力，祇不過

受了損害，用高質素的助聽機是可以幫助他們。現在科技日新月異，電子化的越來越好，也當然愈來愈貴。

隨着器材改良和普及，政府於 1977 年發表白皮書推動融合教育政策方針，再加上 1994 年開始有聾童接受人工耳蝸手術，使得不少聾童在手術後可入讀主流學校。聾童學校便陸續關閉。達言學校於 1991 年交由香港明愛管理，後期遷往柴灣，至 2007 年結束。

學校的宗教生活

不管是在哪一所屬校，詹修女和同工都努力把美好的天主教信仰帶給學生。

我們都是用教區的課本，即教理中心出版的那一本。我們當時是用中文教的，在聖方濟各學校也是。教區未出版那本書之前，我們是用英文課本，但以中文授課。在聖方濟各或是達言和啟明這三間學校，我們都抱著同一個宗旨：不是想他們認識教條那麼簡單，而是想他們認識我們信的是甚麼，意思是希望藉著我們的宗教教育堂，帶他們認識耶穌，認識耶穌的作為、他講的說話。

我們得了這個信仰，認識了這麼好的天主，我們是有責任去告訴他人，特別是讓我們的學生知道。除了一些教友家庭，其實在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很少學生會去領洗，因為她們還不懂這些，到了中學之後會有一些，但並不多。啟明和達言學校幾乎沒有學生會領洗，大部分都不是教友，甚至在中學，我們不會很刻意要他們學道理領洗，除非他們自願。

回看這幾十年，很多（聖方濟各的）學生都是三十多歲自己去找堂區去學道理。當堂區神父問她們：「為甚麼

你現在會來學道理？」她們會說：「現在家庭穩定，工作又穩定，都想到人生缺乏一些東西，所以我想尋求人生的意義在哪裡。」再問她們：「為甚麼那麼多教會，你會選擇這裡？」她們會說：「因為我小時候在天主教學校讀書。」很多個都是這樣說。

達言的學生到普通堂區學道理會比較困難，因此詹修女與天主教老師商量，仿效澳洲等地成立天主教聾人牧民小組，至今快要三十年。

最初是每個月一次，後來是一星期一次。我們告訴同學，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見見同學和接觸天主教信仰就來，因為我們有些學生是天主教的，也希望他們有天主教信仰支持，外面沒有人懂手語，為他們解釋一些東西。

而在達言學校教聖經科殊不容易，需要大量圖片、遊戲和生活例子等去帶出信息。

我們也有機會請到角色模仿者，role model。有一年我們知道有一位聽障神父自出生便嚴重失聰，他在美國出生，自小就戴好的助聽機學講話，後來做了神父。我們知道他在亞洲便邀請他來香港。我們請他來學校與學生聊天。那是第一次。我們的學生自信心提高了很多，覺得他聽覺也跟我們一樣有困難，還讀了大學，還做了神父。

後期還有一位不祇是聽覺有問題，連視覺也有問題，或者你們可能聽過，在《公教報》上亦記載過，陳民安神父³。他曾在香港服務一段時間，之後去了澳門服務。另

³ 陳民安神父 (Cyril Axelrod) 自幼失聰，於1999年失明。他於1988至1999年間，穿梭港澳兩地服務聾人，並自2008年起為香港盲人輔導會擔任視聽障人士復康計劃榮譽顧問。其簡歷見：〈失聰失明神父陳民安訪港 發布新書勉積極面對人生〉，《公教報》，2008年11月16日。

外一位神父 Fr. Charles Dittmeier，狄孟義，曾在香港服務的瑪利諾神父，現在去了柬埔寨。他以前每個禮拜都來，午膳休息的時間與學生聊天，所以都幫助到傳福音的正面形象。現在他隔幾年就來香港開會，他們便會通傳，很多人會去跟他聊天。

從他人身上學習

總體上聽障兒童的入學率和他們的家庭環境有很大關係。家境較差的一般不希望子女讀書，尤其是女孩。然而，有一個家庭令詹修女很難忘。他們是塔門灣的漁民。當時學校已開辦了幾年，該名學生來就讀時已經七、八歲，是他母親透過社會福利署找來的。

我說：「很難得你會送兒子過來。」她說：「我聽到有間學校可以寄宿，我們要出海，一去就是一整個月。我想他讀書。我家人很反對，我丈夫、我的上一輩那些。我跟他們說，我管不了那麼多。他們說，他是聾啞的，全家人沒有讀書，每個人都要出海捕魚。」全家人反對，不想給他讀書，但這個媽媽很好。「我堅持我兒子一定要讀書，就是因為他是聽覺有問題，他將來要獨立生活，要自立，我們沒有書讀也一定要給他讀書。」

我在學生身上也學到很多事情，因為由他們入學開始，真的好像甚麼都不成，但你看到他們很努力，你教他們之後，他們真的很努力學習，他們是比普通人慢全因聽力問題，初期基礎不好，但你看到他們努力付出的毅力時，很好地鼓勵到我們，以更多愛心更多耐力去教育他們。

力爭聽障人士的福祉

在教學生涯中，詹修女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讓社會認識到學生的能力，以及為他們謀福祉。

很多錯覺都認為他們沒有用，不願聘請他們。怎樣去跟外人解釋這個學生有甚麼能力是很困難的，他雖然聽得不清楚但你可以給他文書工作，他不是完全不成的，但很多僱主就是要他電話也要接，所以會碰釘子。這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們會做很多公眾教育。

現在多了人願意請他們工作。香港郵政局、滙豐銀行很好，差不多是其中一兩家最早的機構會請他們做揀信員、文員，不用到櫃面工作，不用接電話，由他們查核支票的簽名。現在還有幾位仍在那裡工作。銀行前幾年裁員，都沒有裁撤那些聽障人士。很多機構就不是了，會看方便，看公司的需要為主。

在鄉村教堂、學校及監獄播種

—— 梅樂真修女

(Sr. Luigia Mindassi, PIME Sisters)

- | | |
|------------|-------------------------|
| 1941年8月11日 | 出生於意大利北部米蘭附近 |
| 1962年 | 加入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宗座外方傳教女修會） |
| 1972年 | 宣發永願，之後來香港服務 |
| 1990年 | 回意大利總會服務 |
| 1997年 | 再度來港 |
| 2014年 | 擔任香港區會會長至今 |



（本文所有圖片由梅修女提供。圖：梅修女領受會衣當天與家人合照。）

訪問、撰文：張小蘭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宗座外方傳教女修會）在香港的歷史，或許比不上一些已在這裡服務逾一個世紀的國際女修會，但這些來自意大利的修女卻也見證了教會在新界區的發展。三十一歲來港的梅樂真修女，學了一點點中文，沒多久就聽從長上的派遣，先在元朗教書，然後到錦田服務，與教友們一起成長，也看著一座座傳統民居式的鄉村教堂在都市化過程中式微。

對修會「一見鍾情」

我少年的時候很熱心參加主日學，也在教堂裡面幫手，因為在意大利我們有個 Catholic Action（公教進行會）¹，我也是一份子。我在教會裡面，最初是自己學習，也教小朋友，也要負責青年活動，到了中間那段時間開始工作。現在回想，有一件很影響我的事，是有個阿姨病了要住院，我與另外一個親戚輪流去照顧她。與病人的接觸很影響我，使我想做護士。不過那時只是很普通的學習，白天打工，晚上讀書。

其實我以為我要結婚的。你知道，那時女孩子開始長大，父母為了女兒的將來開始買些嫁妝。我也與男孩外出，但很快便覺得不太適合，後來才發現自己想加入修會。

在天主教氛圍濃厚的意大利，走修道之路雖則很自然而然，但找「對」修會卻也要經過一番尋覓。對於天主召叫成為聖母無原罪傳教會的修女，梅樂真修女直言是個奇蹟，並指其他 PIME 修女分享時，也有類似經驗。

¹ 公教進行會源於意大利，教宗聖碧岳十世（1903-1914）似乎是第一個應用此名稱的。碧岳十一世（1922-1939）將公教進行會定義為「平信徒參與教會聖統的使徒工作」，藉此幫助聖統的使徒使命而拓展天主的國。他以許多著作和演講為公教進行會訂出大憲章、精神和迫切性。見《神學辭典》，條目 77。

我們堂區有修女，醫院也有，我開始找，見修會會長，但都不覺得是我心目中想要的。有一日，我很記得的，在主日學時，看到一本以前的雜誌，很小的一本，剛好是講我們修會二十五周年。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我心目中想要的。其他修女分享時都有這種經驗。

我住的地方有 PIME Fathers（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他們比較遠，但我們知道他們是 missionary fathers，傳教的，但完全不知道有 PIME Sisters，所以見到有地址電話，便寫信去給她們，去米蘭見她們。決定修道的梅修女，更找來當神父的表哥向父母說項。

其實我不敢對父母說。我有表哥是神父，是堂區神父，於是我叫表哥講。我父母捨不得，但他們見到我怎樣過生活，可能猜到一些。ok 啦，是捨不得，但不會阻止。



（圖：小時候的梅樂真修女與姊姊）

來港承傳修會的中國心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於 1968 年來港，隨即投入教育工作。原本想當護士的梅修女，但在發初願後，修會便安排她讀教育課程，而在加入修會約十年後，獲派遣來港。

為甚麼會選香港？我也不知道。會長說其他地方也需要人，像巴西及印度。我便想隨便吧，無所謂。其實我還未想到哪些地方，靠天主幫我選，之後便來了香港。

我們修女之間會講這裡的情況，像這裡有學校，但不是知道很多，慢慢了解。以前服務過的神父、修女也會告訴我們。

或者有中國的原因，因為我們對中國有一種想像的。根本我們第一批修女是要來中國的，第一批修女在 1946 年已經準備好，但來不了，最後去了印度。但其實我們對中國是有心的。

長達八年在錦田服務

如其他外籍傳教士一樣，梅修女來港第一件事就是學中文，並很快地開始在堂區服務。

那時梨木樹要開一個彌撒中心，神父找人幫忙，我便開始在那裡幫一些忙。那裡有一個很好的、年紀大的教友，是一個傳道員，他有經驗，我又不懂得講中文，我們一起做。我不明白的，或者要知道的，我跟他說，他要告訴我，就是這樣。

修會有學校的²，但我表達希望不在這裡教書。那時元朗的本堂神父問會長，希望有一個修女到那時的崇德中學，是連著一個聖堂，希望修女來幫忙宗教課。會長跟我說讓我去，便開始了。

那是 1976 年左右的事，到元朗只有從大角咀碼頭開出、行駛大帽山的 51 號巴士，車程需時兩個小時。修會著重團體生活，但梅修女每天回到會院，已經精疲力竭。

幾個月後我跟會長說，不行的，因為一大清早出去，晚上回來，團體都休息了。而且神父很想請修女去堂區做牧民工作，那我和我們的楊美玲修女，便開始在元朗住。我們租一個單位，星期六、日回來這裡。



(圖：梅修女 [左二] 與其他外籍人士訪問錦田的鄉村聖堂)

² 宗座外方傳教女修會於 1969 年在梨木樹開辦保祿六世書院，梅修女現為該校校監。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教會在錦田已有幾所規模很小的鄉村教堂，包括上輦村的聖家公所、北圍的聖心小堂，以及在長莆以青磚興建的聖若望小堂。1965年，錦上路上的聖猶達堂建成，1979年升格為堂區。但教區沒有神父可調派到錦田，逐成了梅修女肩負起牧養聖猶達堂區的契機，並住進了現今已成為的彌撒中心的這座教堂，直至大埔堂區有更迫切的牧靈需求，而被派調離開為止。

（胡振中）主教說，錦田天主堂沒有神父，問我們會不會負責這個堂區，元朗那些神父會過來幫忙。我說我可以跟會長講，其實是要些時間想想怎樣做，因為要做的話，就會是我來做，其他修女還未準備好，有一個修女才剛學中文。我們也問其他神父，也要問羅馬（修會的總部），ok了，我們便接手做，開始住在聖堂。

PIME 神父星期六會過來這些村鎮，而慈幼會的神父就會星期日到聖堂開彌撒。我們一個月去一個鄉村，會預先通知教友有彌撒，我們是一個 team（團隊），經常我們兩個一起去。

金錢圍那時有一間天主教小學，校長請我們兩個修女去教小朋友《聖經》，是一個很好的經驗。那裡一班有二十多人，慢慢減小，應該是我們走了之後才關門的。

雖然離開了原來服務的地方，因為以往有時需要在教友家裡開彌撒，從而建立起密切接觸，教友們至今仍會主動聯絡梅修女。

有一個女孩子在那裡讀書的，現在每隔不多久也有聯絡。教友有時有需要或有特別的事，像喪禮，都會通知我，或請我找神父去幫忙。那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他們金錢圍三年前慶祝奉教八十周年，也有請我去。

這樣就住了八年。在大帽山雷公田有幾個教友家庭，但沒有聖堂，我們在一個家庭裡面開彌撒。



(圖：在雷公田教友家中舉行彌撒)

以尊重態度融入文化

在教會的服務過程中，梅修女認為，尊重是融入另一種文化的好方法。新界的鄉村族群很講究傳統，尤其婚喪習俗，需要懂得如何應對。

我們在錦田那時，跟教友上山埋葬，有些事我們不是很明白的，我們就沒有作聲。因為有時你問他們，他們也不曉得怎樣解釋，可能以前就一直是這樣做。可能有很多這樣的事，我們會盡量的去了解，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只能問一下。

我一直很感受到教友的愛，這是很真實的。即是有時未必是教友，如果我出街，不會路去問人，大家都很有熱心，很願意幫我。未試過有需要時沒有人幫我，未試過。

如果不是教友，你跟一個人談論宗教時都會很尊重，讓他明白，但也不需要做哲學的解釋，不需要。其實我想

人們見到教友的生活，才會明白。還有就是我們都要很尊重這裡的其他宗教。

我們自己也要教人們尊重其他宗教，等對方自己想，去明白天主並不是外來的。

在鄉村堂區撒下種子

教會喜歡用撒種子作為傳教的比喻，不追求立時的成效，而是讓天主在適當的時候結出果子。梅修女就遇過這樣的一粒種子。

十年前小巴未有冷氣，要開窗的。我記不得是不是荃灣乘小巴回來，很大風，感到很冷，我請後面的先生把窗關小一點。那時我們還是用頭紗的，那男士見到我著修女衫，問：「你認不認識梅修女？」我感到很奇怪，我想他一定是錦田的人。我問他：「你認識她？你是不是錦田的？」他說：「是啊！」

他說：「我以前上過她的課，很開心。但走錯了路（踏上歧途），沒有再回去。」原來他是那些小朋友中的一個，但他不是教友。那時差不多到站了，我當然說了我是梅修女。我說：「你去聖堂這麼開心，你現在也可以進聖堂。沒有問題的。你去坐坐吧，跟天主談天。」

探訪在囚媽媽

梅修女曾經於1990至97年間被調派回修會在意大利的總會協助。由於香港準備回歸祖國，修會當時擔心不讓傳教士再入境，要她趕忙回來。近年她又當上香港區的會長，沒有時間全身在堂區服務，但又很想做牧靈工作，在機緣巧合之下，開始了監獄探訪。

我認識到一個這裡教過書的老師，她告訴我有這麼一個計劃，是幫一些快做媽媽或剛做媽媽的（囚友），不是

宗教的，只是幫她們怎樣照顧自己，怎樣準備做媽媽。我請她準備好就通知我，怎知真的成功了，現在這個團體是正式的了。

這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團體每月一次，輪流到大欖和羅湖女子懲教所探望女性囚友，而一些外籍囚友尤其需要梅修女協助。

但你要很 flexible（彈性），有時說好那天有三個媽媽，但去到發現有四個、五個，因為裡面有很多變化的。有時那個負責的說：「Sister，你們來吧，因為有些不是香港人，要翻譯。」

她們（囚友）看不出我是 Sister，我不用說甚麼，只是與她們一起，只是做翻譯。有些是來自菲律賓的，所以要說英文。有時認識了她們，給一些鼓勵。

探訪到的人多數不是很多，三、四個，有一次有九個。有些是教友，有些不是。有時也有很年輕的要生孩子，但沒有媽媽在身邊，這是很困難的，雖然那裡的員工都是受過訓練，可能有些是救護人員，懂得怎樣照顧嬰兒。

種子在學校成長

雖然梅修女曾跟長上表示希望在學校以外的地方服務，但她在會院所在的保祿六世書院也有跟學生接觸，並且見到她們的成長。

起初是有修女做校長，宗教氣氛很健康很強的。我自己想到要做甚麼呢？我開始去見 Form 1（中一）的學生，就算只是一年一次，我會介紹我是誰，我做甚麼的。接著 Form 2 也會去，用 video（視頻）那些東西介紹修會在不同地方的服務，特別是當地小朋友讀書的問題。

現在開始 Form 3 也去跟她們講一些修會的東西。這樣，除了 assembly（早會）要講的，我在這裡就已接觸過這些小朋友三次，每年每一班一次。我希望借助那些介紹讓她們反省，學會關心其他沒那麼幸福的小朋友，這會對她們有益處。

學校每年有便服日活動，即當天不用穿校服回校。三年前的便服日，負責的學生來找她，表示收到的幾千元捐款，想用在香港以外其他更需要的地方。

上課時我也會讓她們思考一些國家的學生的生活，跟她們說：「你上課不想對著書枱時，想想其他國家的學生能有一張書枱是很開心的事。」現在我們沒有修女教書了，但都會盡量提一提，很有價值的。

近年，葵青區多了很多低下階層的南亞人居住，而這所女校也多了些信奉伊斯蘭教的學生。

可能因為是女校，這是一個原因，但家長他們應該也知道這是天主教學校。聖經課、assembly 祈禱，她們也在，沒有甚麼不尊重的。我們也尊重她們，她們也有帶頭紗。

她們都是在香港出生，學習有困難，但問題不是很大。最重要是，學校是她們父母選的，他們不是天主教的，最重要是他們有自由去選學校，也知道要上聖經課。

既照顧病人也獲照顧

—— 高慧儀修女

1930 年	在香港出生
1951 年	加入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1959 年	宣發終身願
1959 至 1960 年	在聖保祿孤兒院服務
1960 至 1966 年	在聖保祿醫院工作
1967 至 1978 年	在聖保祿初學院服務
1978 至 1989 年	擔任香港會省省會長
1989 年	前往澳洲服務至今



(圖：高慧儀修女提供)

訪問：夏其龍神父及天主教研究中心職員

撰文：張小蘭

高慧儀修女屬於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這個源自法國的修會團體於 1848 年來港後便開始孤兒院的工作，其後主要在醫療和教育範疇服務。她們在港島及九龍營辦的兩所私立醫院，均被區內人稱為「法國醫院」。高修女曾在港島區的聖保祿醫院及修會的孤兒院工作過，從中看到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和社會變遷。

繁忙的醫院

聖保祿醫院的前身是一所華人婦幼醫院，於 1898 年在灣仔創辦，後來地方不敷應用，於 1908 年在跑馬地開設分院。隨著城鎮發展，灣仔的環境不再適合作為醫院之用，修會購得銅鑼灣一間紡織漂染廠舊址，把聖保祿機構搬遷至此，原來的兩所醫院於 1918 年合併成為現今的聖保祿醫院。

我是 1960 年來到在醫院，到 66 年，雖仍在這裡但停止了工作，66 年離開。我來工作時，醫院可說是剛開始有些改革，第一項是有個會計部。以前也有會計部，但是由一個修女去做所有工作，即是所謂「一腳踢」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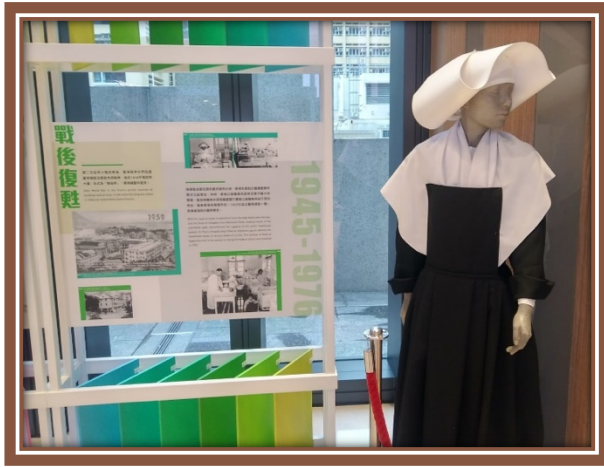
我們在醫院內工作，實在太忙，故對外面的其他醫院之情形所知不多。我們由早上念日課經，參與感恩祭，直到晚上都沒有一分鐘是留給自己。

護士為數不少，且頗容易聘請到護士，她們大多在澳門畢業後過來。初期多的是澳門來的。在手術室工作的護士，也有是從澳洲學成回來的，其餘多是從澳門過來。

醫院的病人

雖然聖保祿醫院是私立醫院，但修女們本著慈善為懷的精神，收費很便宜，甚至有時會免去經濟有困難的病人的費用。

¹ 廣東俗語，甚麼工作都要做，沒有分工的意思。



(圖：聖保祿醫院 2018 年慶祝 120 周年，展出舊式修女會衣及介紹戰後工作)

當時醫院是相當貧困的，雖然收費非常低，但也不是很多人能夠入住私家醫院。當時的人很多去公立醫院。我們的所有病人都是公司的職員，且佔大多數是來自電話公司。

當我來工作時，已有一間細小的產房，但病人卻比較多，尤其是水上人。當時維多利亞公園一帶還未填海，銅鑼灣有很多艇，故有很多艇家的人來。兒童病房亦很多嬰孩，這是由於艇家嬰兒患病是一個大問題，因為艇家出海回來，嬰兒可能發熱已久。此外，可能當時的醫療不普遍，以致我們的育嬰堂有很多棄嬰。

結核病曾是香港二十世紀初一個主要公共衛生問題，在 1939 年更是全年的頭號疾病殺手。二戰後，政府於 1947 年成立第一間結核病診所，之後推展全民健康計劃才慢慢減少，但在六十年代仍有百分之六左右的染病率，直至 1976 年才銷聲匿跡。²

² 程愷禮：〈醫史·Easy：香港結核病歷史〉，《蘋果日報》，2011 年 8 月 15 日。

我覺得當時病人中較多是有肺病，且男病人也是特別多。他們是一家生活支柱，若去政府醫院，只會有藥吃而沒有機會去休養，加上當時藥物不及現在的先進，故可能會給他三個月的藥，然後叫他們自己去休息。但對他們來說，其實很難可以去休息。

有的人負擔得到，便會住進我們這裡，但可能要住上六個月、九個月甚至一年。故當很多病人來時，我們會照顧不來。最初三、四個月的照顧還可以，但其後也會令我們很為難，因為見到他的肺病情況有改善，不能叫他即時出院，否則治癒的過程便會前功盡廢。這也令到我們醫院的經濟陷入困難，亦未能添置儀器。新儀器亦未普遍，我們修女認為可以維持到醫院便算。

獲善心相助的發展

除了服務民眾，醫院也不斷自我改善，力求發展，爭上科技發展的步伐，並且得恩人支持。

隨後在醫院的發展方面，人事有變動，Mother Bernard³ 盡力去發展醫院，設法增設儀器。她是一個護士，當時的省會長。但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單靠醫院的收益，尤其因為那些肺病人成了醫院的最大包袱。

我們的員工很好。他們的薪金是很低。雖然我不清楚政府醫院方面的薪酬是多少，但我估計我們的薪金會比政府醫院的還要低。當時，一個男職員的月薪是一百八十

³ Mother 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納德·貝克維修女，於1960-68年擔任聖保祿修會香港省會長。參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關愛服務百二載》，（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頁208。

元，加上有一日三餐的膳食提供，要這樣去維持一個家庭，其實頗困難。

當時，醫院內沒有很多中產階級的人士。就連住在頭等房的也不是本地人，而是澳門來的。或許他們是澳門的名人，故較能負擔。因為當中有一個病人是插喉的，每個月也有幾天過來換喉，且住頭等房，每天要花上十五元。

我記得澳門名人何賢的耳鼻喉有問題，他也來看我們的 George 蔡（蔡永善醫生）。那是一個葡國的醫生。他很出名，也是一個很好的天主教徒，每一次到醫院，會先進聖堂。他要來我們天主教的醫院工作。他要送病人過來，但我們沒有所需的儀器，何賢就送一部機器來。當時，那部機器價值五千多元。那是送給這個醫生去專做耳鼻喉科的。結果吸引了多些病人來，我們便可以有些收入，去彌補其他方面的不足。

Mother Bernard 省會長本身是護士，當她來的時候，香港的醫療較為蓬勃了，有新的儀器出現，例如是 X-ray 機，醫院便去裝置。我們當時成立小型公司，給醫生去參與投放資本，這樣我們才能夠買得起那些機器，因為那些機器對我們實在是很大的負擔。雖說私家醫院有收入，但當時我們的收入仍很低。因為按當時的環境，我們這樣做才能夠維持一部新的儀器。同時，當時醫院很小，病床也很少。頭等房最多約是二十間。

照顧病患心靈及家人所需

六十年代銅鑼灣及大坑一帶，搭建有不少木屋，形成銅鑼灣四大木屋區——舊大坑村、芽菜坑村、馬山村及蓮花宮村，故求醫者大多來自

窮困階層。病人困在醫院無所事事，高修女便向他們教授教會的要理，讓他們認識天主，使心靈有所寄托，而修會也會不時協助有需要的家庭。

每天下午，我去那裡教授要理，他們由於沒有工作，故全都在那裡休息。病房那地方很不錯，又有大露台，我便把他們都聚在一起，他們就會乖乖地聽道理。多謝天主，很多病人後來康復起來，尤其是他們的家人，都表示感激。

當時的院長真的很有善心，除了照顧病人，也盡量照顧他們的家庭。因為他們未能工作，孩子還年幼。那時的女性亦難找到工廠工作，尤其這區都是木屋，當時在銅鑼灣及大坑上面有很多木屋。此外，有很多家庭來學道理，很多小孩子來聖瑪加利大夜校就讀，我們的學校便開設一班夜校。我不清楚那是甚麼時間上課，只知他們來學道理之後，孩子便過去讀書，之後便自行回家。

成為其他修女的病人

不時與病人接觸，高修女自己也感染了肺病。治療她的是聖高隆龐傳教會的修女。因為當時主治結核病的律敦治療養院就是由這些來自愛爾蘭的修女主理。

當時律敦治醫院的愛爾蘭修女，是跟政府合作做研究的醫生，受到政府的規範。她要照顧政府醫院的病人，不能像私人醫生般外出去看其他病人。我相信，亦可能是時間上的問題。

那時，我成了肺病人。當時的藥物，也不外是那一類像 aspirin（亞士匹靈），因為沒有很多新藥。其實，那些

藥的效果很低，因我曾經是病人，所以我知道。吃藥後三個月也是那樣，直到有一種新藥出現，Aquinas⁴ 問我會否敢去試，而她亦要得到自己的病人同意後才可以去做，因為那藥有很大的副作用。我的病全靠它而好。

很奇怪的，沒有（副作用）。其他病人有很大的副作用，像今天的化療，脫髮、作嘔、不能進食，有的腫。我很幸運，沒有甚麼副作用。但只有一點，她叫我不准碰傷自己，因為我的血不易凝結，且會變黑色，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問題。真多謝天主。

受歡迎的產科

西式的助產法在戰前已逐漸普及，產婦開始到醫院或留產所分娩。聖保祿醫院為回應需求，另建了一幢獨立樓房作產科之用，時人稱為「聖母亭」。

為何產婦會來我們這裡而不去政府醫院？那時政府醫院有很多產科，因為剛是戰後和平，很多人都想有小孩子。我有一個 case（個案），她住了三等產房，正要出院，但無錢支付，她說遲些才交，那我們等了又等。那張賬單不算很昂貴，連同產房和 BB 房費用，當時約二百元。因為她說會遲些支付，那我們便保留該賬單去等她。等了很久，Sister 說不知她會否付，因我們要處理這張賬單，便叫我去看看。那人的地址是在北角的一間鞋店，原來那 BB 的爸爸在那處做職員。他對我說，其實他們已儲

⁴ Sr. Mary Aquinas Monaghan，亞規納修女，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1919 年出生，畢業於都柏林大學醫學院，1948 年來華後一直擔任律敦治療養院院長，直至 1985 年 11 月 28 日因癌症逝世。在任期間對癆病有深入研究，著書立說，並前往世界各地講學。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亞規納修女〉：<https://bit.ly/2KWOiqw>。

蓄了幾個月，但有了 BB 後開支更大，生活困難，沒能力支付。那時我問為甚麼不去政府醫院，以他的經濟情況，這樣又負上一筆債，但如果去政府醫院，則可以儲蓄多些，當 BB 出生後的經濟便沒這麼緊絀。他說他們本來打算去政府醫院，但他的太太很怕，不放心。

那我們就沒法子。雖然他沒錢付，但他的信任給我們很大的安慰。可能他們聽到那些（政府醫院）產房有甚麼不好的聲譽。因為當時的政府醫院不及現在，今天的政府醫院辦得十分好，人人都很滿意。當時，人人都很怕（政府醫院）內的職員，又怕給（實習）學生去試，所以他們很怕，盡量儲錢去找私家醫院，才較安心。

孤兒院的結束

在醫院服務之前，高修女宣發終身願後便在聖保祿孤兒院工作。當時人們普遍生活困難，迫使一些父母棄養孩子。即使環境好轉，父母有能力領回孩子，但有些父母的想法，以及部分孩子尤其已達反叛期的青少年的態度，使得修女們照顧的工作不容易。而真正無父無母的孤兒，修女們會鼓勵他們團結，維繫友情。

直到香港有社會福利署⁵，便結束了（修院的）孤兒院。那時，社會福利署在電台廣播，叫人領回孩子。最初，我們給他們領回，因為很多家庭突然有改變，例如父親失業，便送了孩子過來，但當他的環境轉好，他會把孩子帶回去。有了社會福利署之後，便解散孤兒院。那時，收音機廣播說如果你不領回，你便要來簽紙給人領養，但

⁵ 社會福利署於 1958 年成立，前身是華民政務司署轄下次於部級的社會局，於 1947 年成立。

如果過了某個時間而你又未前來簽紙，便算你放棄，那孤兒院便結束了。

放棄，即你再不要那個孩子，於是他成為了真正的孤兒。我們在這裡繼續去養育他們，直至他們長大到成年，自己外出找工作。我們就繼續給他們讀書。

當時有些孩子沒有人領養，也許是由於年紀太大，像十四、五歲青少年，我們給他們去讀書，別人不知他們是孤兒。他們上學後回來我們的地方住，直至他們可以自己外面找工作。我們現在也有去團結他們，因為他們沒有甚麼親人。他們會維繫自己的一群朋友。每年的年初三，他們也回來跟我們聚舊。

好像是在我去醫院前，可能是1951年，在孤兒院做了一年。那時我們已經開始勸他們帶（孩子）回家，那才有點親情關係，總好過跟陌生人扛一起，因為他們還年幼，只有四、五歲。所以，有些人帶孩子回去，但孩子會驚，不肯回去。像在星期日，我們帶有些孩子回家，但他們卻不太想去。有些孩子年紀大一點，像有兩個大約十二歲，他們很生氣，因為原來他們有弟妹，父母的想法是他們已在你們那裡安定住下，便可以不理，之後再有孩子，可以不放棄的，便自己繼續養。所以，這對那些孩子的影響很大。

很難去平服他們。若沒有見他們的家庭還好，見了之後回來便很反叛，我們很辛苦去照顧他們，他們的脾氣很差。後來，社會福利署照顧所有孤兒，我們仍盡量去繼續照顧有些孩子，因為有幾個是傷殘的。後來，當要分開時，他們也捨不得我們。應是多謝天主，我們應付過去，經過那個窮困的時間。知道他們有問題，沒法不去幫忙。

當時不像現在有社會福利、有保險，一個家庭有時真是求救無門。他們可以到哪處去求救？要向親朋借也不行，因每個人都生活困難。

以前的職員知道他們所照顧的人很有需要，幫助那些人是對他們的一種鼓勵，故不會去斤斤計較，真想去完成一份工作。我很欣賞以前老一輩的員工，他們會用心做，彼此合作，和我們一起工作而不計較。我很欣賞那段時間，多謝天主給我過了那段時間。

修道院山下的亞妹

——黃亞妹

- 1935 年 出生於香港仔
1951 年 於聖伯多祿堂領洗
1951 年 與天主教徒何偉明結婚



(本文所有圖片由黃亞妹女士提供)

黃亞妹婆婆個子不高，染了一頭烏黑的短鬚髮，笑起来一雙藍灰色的眼睛也會眯眯笑。過時過節，她的七個女兒一個兒子、女婿、媳婦、七個孫和三個曾孫都會濟濟一堂。大家最期待也最回味的，是亞妹的手打「婆婆牌魚肉」。大家也知道，她愛喝茶也愛吃西餐，尤其愛喝咖啡。雖然她沒讀過書，但遊客用英語問路去 Stanley，她懂得帶他們去搭往赤柱的巴士。在第二次訪談後，她帶我們到南港島線橋下新開放的香葉徑，指著山邊的樹叢說：

這裡有條樓梯可以走上修道院的，那邊前面就是我們舊屋。

七十年前，就在這裡，天主教和修院成了黃亞妹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仔修院山下

黃亞妹原名黃愛珍，如以身份證作準的話，她生於 1935 年，現年八十四歲。她在香港仔土生土長，父親黃亞土和母親馬水根都是水上人，育有十名子女，亞妹排第三。堂兄弟叫亞妹做「大兵頭」，因為她總行頭當先，大家都會先問她意見，像當兵帶頭。母親兒時在香港仔浸信會讀書，因此她們全家都算是基督教徒。但由於小時候正值日佔時期，亞妹並沒有機會讀書。亞妹為了家人溫飽，曾「做過三次女」¹；在差不多和平時，以兩斗米賣給馬留港造船廠（音譯）當義女，先後隨義母及其孫女兩家在香港仔、水街一帶打工，而第三次就是在何十四家打工。

住在修院山下的何十四，又名何福，跟亞妹的母親是浸信會的同學，而何十四的妻子張九妹，承包了華南總修院（聖神修院的前身）往來香港仔的水上交通。因此，亞妹在何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櫂艇（搖船）——接送神父和修士往來香港仔和修院。自那時起，黃婆婆由「愛珍」變成「亞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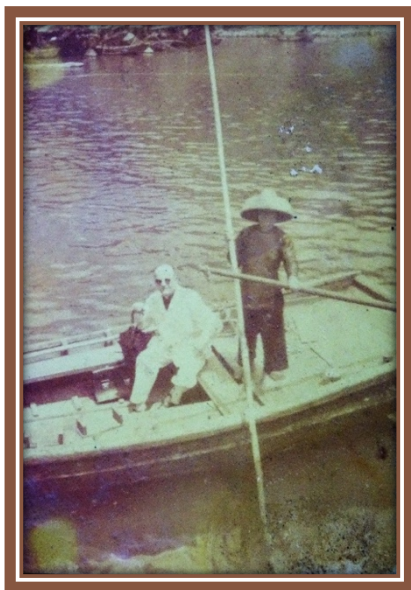
亞妹這名字都是神父改的，後來人人也這樣叫，就照用這名字了。

¹ 「做女」意指賣給另一家人當義女打住家工。

「亞妹——過海——」

七十年代前，從香港仔到黃竹坑山上華南總修院必須經水路，搭小艇在香港仔舊官立學校（約現在香港仔網球場靠山方向），到修院山下的埠頭（約現在涌尾寵物公園），再走樓梯上山。亞妹未幫張九妹打工前，主要是由張九妹的養子何偉明負責櫂艇的。亞妹覆述何偉明當年的情形：

打仗那時，神父都要過海到聖堂開彌撒的。那時（何偉明）就送馬良神父²過海啦，日本仔那些炸彈轟轟聲整排落下來。剛好海中間有隻鶴佬船，相熟的。「哎呀，細佬，你快些上來上來。」拿張棉胎蓋著他，炸彈降下來嘛，就救了他一命，要不然那個炸彈下來，就沒命的了，炸死的了。那時他送過海的那隻船炸穿了。那時真的很危



（圖：負責搖船的黃亞妹與神父於艇上合照）

險的，整排飛機來，整排飛機一起落炸彈，隆隆聲，好像一窩雀鳥在飛，一排地飛，一排地落下。

當年亞妹還未叫亞妹，她還在她父親那邊開新（出海捕魚）。這驚險的一幕，是亞妹的丈夫——也就是何十四和張九妹的養子何偉明——後來告訴她的。何和張有一個親生女兒和三個養子女，何偉明就是他們從凌月仙嬰堂領養出來的。何偉明在嘉諾撒培德學校讀到四年

² 馬良神父（John O' Meara，1898-1991），愛爾蘭籍耶穌會會士，1933年抵港。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馬良神父〉：<https://bit.ly/2XHSHjP>。

級後，便要輟學到修院廚房打工。大概自四十年代中期起，櫂艇的工作由亞妹接手。

亞妹每天櫂的那隻艇是修院的。水路是往修院的唯一路線，由於神父和修士不可外宿，當他們外出時，亞妹必須先問他們回程時間。

神父有時講中文，有時講英文。有些神父講中文講得好好的，有的斷斷續續，但我又很明白他們說甚麼。比如他們外出，我問他們幾點鐘回來，要泊船到碼頭。例如大陸或外國來的，[模仿說普通話]幾點返來？一點鐘、十二點鐘、十一點鐘。那音調很有趣的，但我又明白，有時會比手勢。

亞妹說，比較難聽得懂的是來自上海和北平的修士。於是修院負責買辦的王先生就會教導亞妹：「[模仿說普通話]『幾點返來』，不是說『返來』，是[模仿說普通話]『回來』，他說『一點回來』、『十二點回來』。」他一教亞妹就明白了。有時候，神父會到半夜才回來，亞妹也必須候命。

「包神父，幾點回來呀？」「我今晚呀，我猜妳會很暈的了，我要一點鐘才開完彌撒回來。」我那時泊在那個碼頭，坐在船內，很冷很冷。「亞妹，冷死妳囉，怎辦呀？」有時有些神父呢，穿著件西裝。「我給妳這外套等我們回來啦。妳披在肩膀啦，要不然冷死妳喇，我們這麼晚才回來。我們又不能不外出，我們出去開彌撒，有時出去開會。」

縱然得到神父的好意，亞妹卻仍然要捱凍，因為她的家姑不一會便拿走西裝外套，給她在漁市場的女婿穿著。有些神父比較友善，有些性格則不同。

要過海的神父都會大叫「過海——長行艇過海——」或是「亞妹——過海——」要是反應慢一點，比較惡和急性子一點的就會責備船家。

遲一點點過去接他過海，他便會罵，很惡的。「亞妹，做甚麼？妳睡著了聽不到我叫過海嗎？」

亞妹基本上是隨傳隨到的，看見神父剛下石梯級，便要匆匆過去接他過海，畢竟神父多趕著外出開彌撒。亞妹就是這樣，不分四季、不分陰晴地接送神父過海。

既然靠櫂艇為生，又是水上人，亞妹必定是游泳高手吧？但原來亞妹是不諳水性的。有一次，當亞妹如常地接送神父過海時，不慎掉到海裡，全靠神父拉她上岸，救了她一命：

我有一次搖著搖著搖斷了繫在那櫂檣和艇身的繩子，我給彈了下水。就是搖到一半，跌了落水。糟糕了，怎辦？「亞妹，亞妹，妳在哪？妳在哪？」他坐在船艙中不斷摸船邊周圍，我就抓著船邊。「哎呀，亞妹呀亞妹，我摸到妳隻手喇。妳快些用力。用力！用力！快些上來，上返來，要不然妳沒命的了。要是鬆了手就沒命的了，妳不懂游泳會浸死的。」我不懂游水的嘛，他便死命地拉我上去，拉到條船都快要反轉了。我說：「不是呀神父，你要走到後面一點，你要站在正中間才拉我上來。要不然船翻了，連你也會跌落水的。」「對啊，對啊，我挪過一點，妳千萬別放開手呀！妳抓緊我的手呀！」就是這樣他拉我上來。「好了，妳會活到一百歲的，亞妹。妳活下來了，天主保佑妳，讓妳長命一點呀！」

就這樣，亞妹活下來又繼續櫂艇。除神父外，眾多的修士也是亞妹的乘客。當中，有一個讓亞妹特別印象深刻：

那時有個修士經常發羊吊（癲癇症發作），搭我們船過海呢，一發羊吊就在船上嘔白泡啦、撐手撐腳啦。那時便找一塊布……那時哪會那麼乾淨，怕有菌有甚麼的……

就找一塊布給他咬著，以防他咬斷舌頭。後來那修士跟我說：「亞妹多謝妳救我，我這樣慘嚇到妳這麼淒涼，妳又不害怕。如果沒有妳救我，我的舌頭已咬斷幾次了。」我總會放條毛巾在船，弄髒了我就洗乾淨，放好。捏成一大球，塞在他口，讓他咬著，不用咬斷舌頭。他不知道的嘛，他經常嘔白泡呀。我們那隻船有個大船艙的嘛，按他下去躺在那邊，讓他咬著布，然後幫他拉手腳，不要抽搐在一起。

亞妹還繪形繪聲地描述了自己如何用固定船艇的竹來將乘客彈上陸地、如何頂著大肚幫母親接生等情景。雖然沒受過正式教育，但亞妹聰慧和刻苦的性格，讓她與修院的關係並不囿於接載神父的艇上。

從修院山下到山上再到山外

原來除了接送神父和修士，當有外國神父到訪或有人到修院避靜時，也會搭亞妹的艇，所以阿妹一天就可能去修院好幾次。如果有行李的話，她還要幫忙抬上去。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神父，來來去去的真的很多很多，最慘是我要幫他們搬行李上修道院。來修院避靜也好，來修院住宿也好，幫他揹行李上去，一大筐：書啦、聖經書啦、衣服啦那些。欸，一大筐呀！像這個那麼大的〔指著家中一個三十吋的行李箱〕。那時不知為何這麼大力的。這樣走百多級石梯，托著行李上去不敢放在地上休息，怕沒有人幫我推回肩上托呀。

除了搬運行李，偶爾還要幫忙送雞蛋、水果上修院，還要送信。

送信呢，就大多都在碼頭的了。在碼頭放下讓我拿上去，逐間房間派……ABCD。（您不會寫字又怎樣分

送？) 我會認字的嘛，王先生帶過我一次的。「欸，亞妹，預先教妳這個 ABCDEFG。」我便死記爛記囉，那時候記性好一點的。

亞妹在修院還會幫忙割草、修草皮、移送遺體和在大瞻禮前熨燙祭衣。每星期，她或何偉明都要到堅道的主教座堂拿「送聖體」的麵餅。但亞妹最期待又最津津樂道的，是幫王先生外出購物。王先生是越南人，原在修院當修士，後轉做買辦。所謂買辦，就是負責到中、上環的辦館採購修院所需的食物和物資。要是打算買入較多物資的那天，王先生就會請何偉明或亞妹一起搭巴士出去幫忙運送。提起辦館，亞妹雙眼發光：

如果和我出去呢，我就很開心。發達喇！請我食個餐！[笑]

王先生眼見平日亞妹工作辛勞又聽話，帶亞妹外出買辦時多會用自己的薪金請她吃西餐，有時是公司三文治，有時是一杯奶茶或咖啡。她回憶道：

那時的咖啡是特別好喝的，不知是不是那時候少喝。我們中國人哪會有咖啡有這些喝的？那時候多少人沒喝過咖啡？覺得自己很幸運呀，有杯咖啡，又懂得吃西餐，很厲害！

不過亞妹最難忘的，還是吃牛排：

以前那些餐廳呀很羅曼（浪漫）的，小小一間，很漂亮的。真的只有鬼佬光顧，沒有中國人的，很少中國人。嘩！我呀，很害怕呀！穿著雙屐啦，很害怕，即是啥中國人都沒有，我自己又不懂用叉嘛。王先生教我用叉、教我怎樣吃啦、又「鋸扒」（吃牛排）啦。「鋸扒」呀！[笑逐顏開] 嘩——開心到我，真是差點要暈倒呀！我已經很

害怕的了，去那些地方又沒有中國人，還要我「鋸扒」！教我怎樣切、怎樣吃，要斯文一點地吃。嘩！我的心跳到卜卜聲。[笑]

那時候剛剛到何十四家打工的亞妹才十多歲。雖然每次外出採購，物資都非常沉重，但無論多重亞妹也會幫忙。七十年後的今天，亞妹依然銘記王先生的恩情。就是這樣，自和平後，亞妹與修院結下不解緣，她也一直權艇到六十年代末政府收地填海和建鴨洲大橋，才轉到石排灣的聖伯多祿小學當校工「妹姐」。

「你們求，必要給你們」（瑪 7：7）

原本是基督教徒的亞妹自十歲後，她的生活便跟天主教密不可分，而她跟丈夫何偉明的婚事，更是由神父一手撮合的。那時的神父都很疼亞妹，但又覺得她總是苦著臉。

神父說：「以妳年紀應該很開心才對。」我說：「不開心，事頭婆（老闆娘）總是罵我，我把錢都給了她她也罵我，她欺侮那個 boy 很慘。他們說，男生叫做 boy 嘛，我便跟著說。」

原來那時亞妹常看見老闆打何偉明，用鐵鎚仔打到他滿身滿臉都是血。神父便說：「他又這麼可憐，妳又這樣可憐，如果你們年齡夠就結婚啦，可憐他吧，婚後有個照應。」就是這樣，神父著亞妹到培德小學跟彭愛金修女³學道理。亞妹便每星期到培德的休息室（位於前嘉諾撒幼稚園，即現兆群大廈）上課。

彭姑娘教我們道理的，教我們念經分開幾次教的，很好的。「萬福瑪利亞」教完了，又要再重覆，又要再來，

³ 彭愛金修女（1914-2008），原籍廣東順德，1931年加入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彭愛金修女〉：<https://bit.ly/2W1Od6c>。

看看你是否全都記得一條經怎樣。「吾主耶穌基利斯督」就分開來教，再續回去。彭姑娘教我們教得很用心的。

領受聖洗和堅振聖事後，亞妹和天主教徒何偉明結婚。雖然他倆的結婚證書上的結婚地點是「香港仔華南修院山腳木屋」，但亞妹澄清說那只是他們的住處，他們是在聖伯多祿聖堂結婚的。



(圖：何偉明和亞妹的結婚證書)

你知道伯多祿聖堂不像現在這麼漂亮的嗎？伯多祿聖堂像一間小屋很長的，很小很矮而已，沒這麼大的。我們是住在木屋，結婚在那邊登記，但在聖堂結婚。那時有紅地毯給我們走的，很厲害的，神父帶來的嘛。修道院神父陪我們一起去聖堂結婚的。（哪位神父主禮？）好像是陳丹書神父⁴。

⁴ 陳丹書神父 (1890-1975)，原籍新界西貢鹽田梓，1917年晉鐸。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陳丹書神父)：<https://bit.ly/2PqeDMc>。

民國四十年（1951年），十七歲的黃亞妹（註：結婚證書上亞妹的出生年份是1934年）和十六歲的何偉明在神父的見證下結婚，隨後出生的八名子女也順理成章地領洗。

除大女兒外，何偉明和亞妹的子女全都在天主教學校讀書。因此，一家亦受益於五、六十年代教會派發的救濟品。但原來早在救濟品尚未普及的年代，亞妹便已請求修院神父接濟附近的貧困兒童。

後來才有救濟品，起初也沒有。加德佛（音譯，當時送麵包給修院的公司）送來的麵包很大條的。即是（神父只吃麵包中心部分的）肉而已，那些麵包皮都會切出來丟掉。初時我就跟當家神父說，我說：「Father，有許多人都是很淒涼沒得吃，那些小孩真的沒得吃會餓死的。你可不可以將那些皮拿出來救濟他們、幫助他們呢？每天給他們一片皮吃，不要拿去丟掉？」他說：「這樣嘛，好呀好呀。妳找何偉明負責將麵包皮切出來，再叫他拿去石梯級那邊派給他們吧。」

因此，亞妹也會接載小孩到修院。小孩上到修院，跟修士讀書寫字學習一小時，便可以拿麵包皮吃。到後來，教會在修院、學校和社區中心派麵包、麵粉、麵條、油等糧食，培德的校長曾修女和老阿嬤肥孀都對何家十分關顧。而亞妹一家亦會善用這些糧食，例如亞妹除了授母乳外，亦會煮粥水加點鷹嘜煉奶餵給初生子女吃。由於亞妹自小在修院出入、偶爾會跟何十四與大使館的老外上司坐漂流艇尋寶、又會跟黃亞土到深水灣高爾夫球場撿球，她對西方飲食文化的認識相對較多。有時候，附近的漁民拿了救濟品也會請教亞妹：

剛剛和平時都有派發些救濟品，那時候會派些芝士，那些漁民當作肥皂洗衣服。那些住船的人不懂嘛，不知道

那些是芝士可以食用，但洗來洗去也不能去污。那時住船的我很多也認識的。「亞妹，這些是甚麼？」「這是芝士，是鬼佬芝士，用來夾麵包吃的。」「甚麼？我們當肥皂洗呢！」「怎麼這般浪費呢？」「我們不知道是吃的，便當肥皂用。」

當普遍華人領取了麵粉和奶粉回家會用來煎糕、煎鉢罉（薄罉）時，何偉明就會根據修院廚房的步驟，在家用麵粉蒸蛋糕。亞妹也不禁稱讚丈夫蒸蛋糕的技巧了得！

除了請求神父派麵包皮外，亞妹說：

我老是有事求神父幫忙，神父說：「亞妹呀，妳怎麼有這麼多事求我們的？」

究竟亞妹還求過神父甚麼呢？張九妹在五十年代初又在嬰堂領養了小女孩何桂珍，主要由亞妹照顧，有次桂珍病重，於是亞妹跪著求神父送她去醫院，往後一個多月，亞妹每天徒步從香港仔走到半山的嘉諾撒醫院去探望桂珍。何十四生前曾吩咐亞妹，求神父讓他葬於跑馬地墳場，於是何十四離世後，亞妹跪求院長夏神父⁵幫忙圓願。

那時我真的在修道院大門那邊跪，跪神父呀，跪這個夏神父。「神父呀，你讓阿何十四在跑馬地，給他個地方啦。他很喜歡那裡，你可不可以幫忙我呢？」「唉，亞妹，妳這樣求我，我怎能不幫忙妳呢？妳又幫助了我們修道院這麼多神父，許多許多困難妳都捱過了，這個忙我能不能幫妳嗎？不能。我跟伯多祿堂本堂神父說說吧。」

⁵ 夏禮士神父 (Richard Harris, 1903-1998)，愛爾蘭耶穌會會士，1929年抵港。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夏禮士神父〉：<https://bit.ly/2IF0dYe>。

亞妹除了請求神父幫助家人，其同理心亦驅使她求神父救助附近的一些老弱婦孺。儘管何家後來搬上大廈，住過石排灣邨、華富邨再搬回香港仔，亞妹做過校工、漁市場分魚、家庭作業式串膠花、啤錶帶等工作，但亞妹念茲在茲的還是修院和聖伯多祿堂。

重回香港仔

這數十年來，亞妹依然堅持每星期回到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望彌撒。亞妹沒受過正式教育，訪談時，她說著水上人口音的廣東話，偶爾錯用成語，又偶爾夾雜英語單詞。她說得最多的英語單詞是「father」，給她看天主教教區檔案中的神父照片，她才剛說「很多很多都很眼熟，但都忘了名字」，邊看卻邊說：

郭神父⁶有兩兄弟，還有個姐姐也來過，長得一模一樣的。郭神父跟我們最熟稔，後來不知怎的他搭巴士從上層下來傷了腰骨，後來就進了老人院。我們搬到石排灣，他也經常上來探望我們，很樂於助人的，常常幫助教友的，很好的。

蔡神父呢，很健談的，過海時甚麼也聊一頓，他講我們的語言講很好很清楚。

[指著徐誠斌主教照片] 這個升了做主教嘛！

史神父後來才去伯多祿堂。

馬神父是日本仔那時候的，馬神父在修道院最久，那時是院長來的。

⁶ 郭樂施神父（又名郭年士·Edward Collins·1915-2003），愛爾蘭籍耶穌會士，1949年抵港。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郭樂施神父〉：<https://bit.ly/2GDk7AO>。

紀神父，是愛爾蘭來的，對呀，他告訴過我。⁷

看著照片，亞妹問了好幾次，為甚麼還未見到她最熟稔的科神父。終於找到了科利神父⁸的照片，亞妹忍不住嘴角上揚：

科神父，這是 Father 科喇，他的樣子很慈祥的。

三十年後，亞妹又搬回香港仔離從前修院山下木屋不遠的地方。那天，她帶我們「重遊」故居，娓娓道來她在訪談中曾提及的人、事、物的確實位置。曾幾何時，亞妹因自己從前一些善意的謊言和過犯而耿耿於懷，她便問神父她有沒有罪。當時神父跟她這樣說：

妳沒有罪，受難就是妳。妳是犯了罪，但妳是為了幫助別人，天主要寬恕妳，賜福給妳，讓妳長命百歲。妳幫助別人，妳要做好心，這是好的。妳積福吧，將來妳慢慢就會好，一代一代都好，會很平靜、很好、很乖的。天主會給妳福氣。

亞妹婆婆撥了撥她那頭烏黑的短鬚髮，眯起一雙藍灰色的眼睛微笑著說。就是憑著這句話，亞妹跨過了大小難關。嚐盡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她又回到了香港仔修院山下。

⁷ 蔡伯德神父 (Patrick Joy · 1892-1970) · 愛爾蘭籍耶穌會士 · 1927 年抵港。
史達生神父 (Ernest Stassen · 1922-1981) · 比利時籍聖母聖心會士 · 1954 年抵港。
馬良神父 (John O' Meara · 1898-1991) · 愛爾蘭籍耶穌會士 · 1933 年抵港。
紀烈義神父 (James Kelly · 1921-2000) · 愛爾蘭籍耶穌會士 · 1948 年抵港。
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蔡伯德神父〉：<https://bit.ly/2PxI0g1>；
〈史達生神父〉：<https://bit.ly/2DuazpH>；〈馬良神父〉：<https://bit.ly/2XHShJp>；
〈紀烈義神父〉：<https://bit.ly/2ZtoZ2A>。

⁸ 科利神父 (John Foley · 1907-1991) · 愛爾蘭籍耶穌會會士 · 1933 年抵港。參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科利神父〉：<https://bit.ly/2IKISwi>。



(圖：全家福·攝於 1970 年·右為何偉明·上排左起：二女凱欣、五子志霖、六女金萍、大女文鳳、黃亞妹·下排左起：四女金燕、三女金鈴、何桂珍、七女金玉·么女金佩尚未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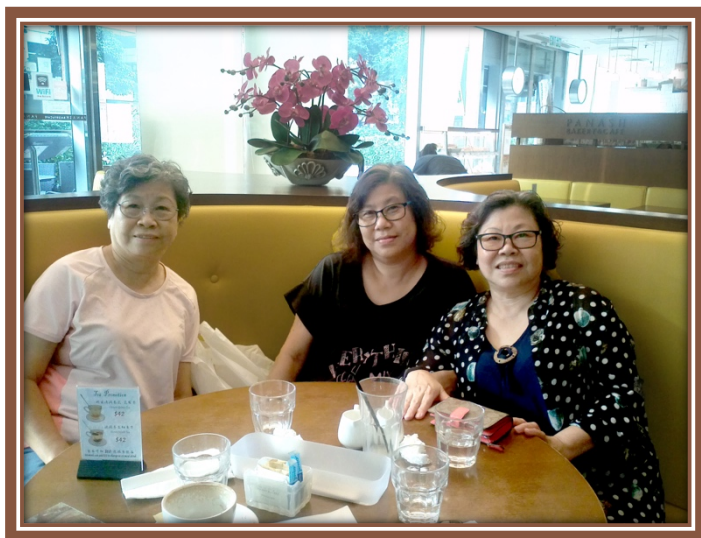


(圖：全家福·攝於 2019)

感謝教會接濟的家庭

—— 梁氏三姊妹 (Annie、Connie、Judy)

- 1950 年 Annie 出生
1954 年 Connie 出生
1957 年 Judy 出生，梁母與四名兒女在玫瑰堂領洗
1962 年 梁氏一家搬到觀塘



(圖：左起：Annie、Judy、Connie)

訪問、撰文：黃奕清

「奶粉教友」、「麵粉教友」、「義學」和「天台學校」等字眼，很多人大概都有所聽聞。它們代表著天主教會於二十世紀中期在香港社會裡的一種角色與工作，而對於很多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教友來說，它們更是一份共同記憶。梁氏三姊妹所分享的教會經驗，或許也是不少教友家庭的故事。

在六兄弟姊妹中，Annie、Connie 和 Judy 三姊妹於五十年代先後在內地和香港出世。她們本來居於九龍上海街，1962 年搬到觀塘鯉魚門道邨（觀塘警署一帶），直至各自結婚組織家庭。排行第二的 Connie 說：

我媽媽「落嚟」¹ 香港找我爸爸，我是在香港出生的。54 年我出生之後，到 56 年我弟弟，即她（Judy）對上那個哥哥，也出生了。

後來我爸爸說要回國內帶我姐姐（Annie）來，我姐姐來了後她（Judy）便出生。她出生的時候，我們就一起領洗。

那時我們很窮，現在的叫「劏房」，我們那時候沒有劏房，一層樓有很多伙人，每伙有一間房。但我們沒錢租房，我們租一個床位，每個人走過都見到我們的，只能夠拉一層布簾來睡覺，一家多口睡在同一張床。

我們住床位的時候，對面房的一位太太，就是我們後來的代母²。因為她見到我們的媽媽，一個鄉下的女人，甚麼都不懂，又不識字，看到我們這樣的環境，就跟我們說：「不如帶你們返去聖堂，教會那裡。」

¹ 從中國大陸到來的意思。

² 天主教的傳統裡，不論是成人或兒童入教，每一位候洗者都必須有一位代父或代母。因為候洗者本身分享了教會團體的信仰，而代父母就是教會團體的代表；他們以祈禱和德表，在信仰路上陪伴和指導候洗者。

領洗於尖沙咀玫瑰堂

為著這次訪談，Connie 特意翻看她保存了逾六十年的兒時記錄。

她 (Judy) 八月出世，我們十二月領洗，我們的領洗紙上寫著的。當時除了爸爸，我們全家都領洗了。

領洗之後，他們 (聖堂) 找人「湊住」³ 我們，好好的。逢星期六返主日學，星期日要去望彌撒，到達某年齡，就叫你初領聖體，跟著領堅振。他們有一組人「湊住」我們。

那時的天主教，是有錢人信奉的，窮人是給她打救。

這是 Connie 當時對教會的理解。她們一家在生活上，確實經驗了教會多方面的照料，由日用物品，包括吃的，如麵食，不能吃的，如衣服，以至教育。

玫瑰堂旁邊就是聖瑪利書院，是女子學校，是很有錢的人讀的。那兒的修女和老師怎樣的好呢？辦一些叫「義學」，是不收費的，由幼稚園開始，一年級、二年級等。因為我是女孩子，我都可以讀。忘了是四點多還是五點才上學的，即等人家放了學，我們就到聖瑪利，由義工教導我們。⁴

我最記得我第一次，大姐也有去，去聖瑪利書院的聖誕節大餐，我只去過一次，大姐去過兩次。吃西餐的，第一次看見如此的場面。現在已記不起吃甚麼，只記得場面極之「墟冚」⁵。首先是讀正規學校的女孩子食，她們吃完，收拾好，才輪到我們。

³ 廣東話，照顧、帶領的意思。

⁴ 聖瑪利書院由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 1900 年創辦，修女早在戰後初期已開始借用書院的課室，為貧窮兒童開設夜校，上課時間為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參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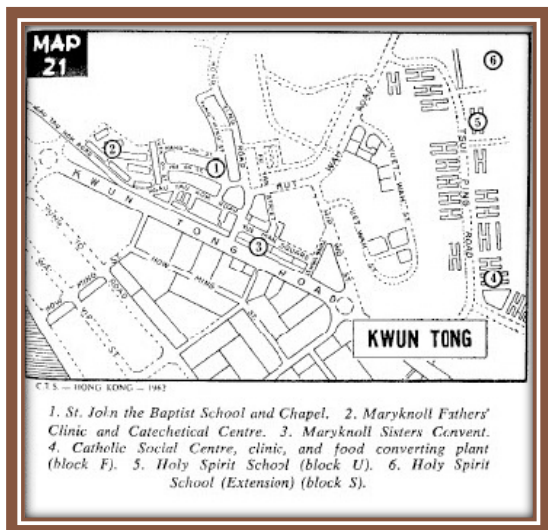
⁵ 場面熱鬧盛大。

觀塘雞寮 F 座

Connie 在聖瑪利書院上義學至小學二年班的某一個學期為止，因為一家人要搬到觀塘鯉魚門道邨。那是 1962 年，她們來到新的社區，投入的是一個跟玫瑰堂很不一樣的聖堂，在觀塘徙置區（俗稱「雞寮」）之內。Connie 說：

那時還未叫「耶穌復活堂」的，我們叫「F 座」，那時是徙置區，號碼由 A 至 Z 來分座數。

一進去，有兩邊，中間是廁所和浴室。我們教堂在地面，就不用有浴室，只有廁所。兩邊就像課室般，那時都有學校，都是這樣的，我們的「聖神學校」就是這樣。這些房間，就是工作人員辦事或辦活動的地方。我們再走進去，才是祭台。



（圖：英文版《1962 年香港天主教指南（重印）》內的地圖，4 號為 F 座的位置）

Annie 記得那裡有義診服務，她說：

一進門口，右手邊是診所，義診的，有位肥姑娘；有甚麼事，就跟姑娘說。左手邊最後面那裡，就做聖堂。分

開兩邊，一邊是祭台，我們在另一邊坐。

Connie 繼續介紹：

診所的對面，有個房間，買了一套機器，請一位師傅回來打麵，做上海麵。你知道甚麼是上海麵嗎？濕的、白色的。做好之後掛在那裡，再捆成一團一團。我們教友有一張卡，例如我們家有八人，登記一家八口，他便看你人口多少而給你的份量。

那時每個星期六都是我去領的，我是做跑腿去拿這些的。有時候派米，有時候是麵條，有時候有奶粉。我最記得給我弟弟的奶粉。我最小的弟弟 63 年出生，那時他便有奶粉喝了，我另一個妹妹是喝「壽星公煉奶」的。這個弟弟呢，很多時是由我開奶的，那我就「靜雞雞」⁶先放一羹到自己的口，奶粉在口裡面溶掉；嘩！未吃過這麼好味的東西！因為那時物資很窮困。

我們那時沒有政府照顧，若不是幸得張夢霞女士，即是我代母，叫我們去信教，我們那來吃的？

不過，她們也聽聞過有些人會對教友出言不遜，例如：「你信天主教，你一定是貪那些午餐肉、煉奶、奶粉。」

對於教會在那個年代的香港，尤其是生活上的救濟，以及教育和醫療等服務，Judy 認為是救了很多。Annie 亦和應道，很多人都是因為去了教會而得到讀書的機會。

三姊妹憶述，當時 F 座的天台，是教會義辦的幼稚園，Judy 跟她的弟妹也是在那裡讀完幼稚園，再去「聖神學校」。按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校友會有限公司於 2014 年為向賴存忠神父致敬而印製的專輯所

⁶ 悄悄地、偷偷地的意思。

述，聖神學校是開設於雞寮第十四座的「徙置大廈學校」，由瑪利諾修女管理。

禮儀本地化前的主日彌撒

當年梁媽媽除了主日彌撒，就沒有讓孩子們參加善會和其他堂區活動，幾姊妹只得瞞著媽媽偷偷地加入聖母軍，因此在她們的堂區生活片段裡，主要都是禮儀的參與。那時還是禮儀改革之前，Connie說：

每個星期日，我最記得我們領洗後，長大一點，初領聖體，有了那條紗巾之後，一忘記帶那紗巾去望彌撒，就很緊張。要常常戴著白色的紗巾，很漂亮的。要用髮夾夾住，忘記帶髮夾又會很慌張。但現在回想，覺得很漂亮。

我們小時候，全部都是那些我們不知道的文，不懂的。即使初初來到耶穌復活堂，那時的F座，神父都是念拉丁文的。

神父講道是用「唔咸唔淡」⁷的廣東話，通常人人都「樁眼瞓」，細有細「樁」，大有大「樁」。

神父背著我們做彌撒的。其實我都不知道他在說甚麼，總之，起身便起身，坐下便坐下，跪下便跪下，領聖體，最神聖的一刻，一定要跪下。出去領聖體時，排住隊全部跪著。輔祭的袍很漂亮的，又紅又白，好傳統的，他拿著金色的盤，放在下巴底，怕屑碎會掉下。這樣跪著，神父把餅放在舌尖上。口領聖體很久了，到十幾歲仍是口領。

到後期，即是一九七幾年的時候，已經改善了很多。例如我們懂得如何念經。其實我覺得，教導是很重要的。

⁷ 「唔咸唔淡」指發音不標準，而「樁眼瞓」是指打瞌睡。

像佩琪（Annie 女兒）那一輩長大了，他們懂得教現在年幼的。所以現在的小朋友，四、五歲，如果他們是到天主教學校讀書，全部都懂得念經。那時雖然我們是天主教，但念得不好。

記憶裡的神父與修女

無論在玫瑰堂，還是 F 座，三姊妹對神父都不大認識。Annie 提到，她們辦告解都要由修女安排的。Connie 憶述：

那時辦告解是很傳統的，有東西遮蓋著，大家在外邊排隊，進去要跪下，神父看不到你的樣子，用耳朵聽，你的嘴向著分隔的網說話。現在有些舊教堂也有，新的就沒有了。

Judy 有感以前的神父比較高高在上，現在的神父較親民。Connie 亦提到，以前神父主持完彌撒便「匿埋」⁸，現在彌撒一結束，神父便站在聖堂門口，跟教友們打招呼。

相對地，她們記得以前有很多女性在堂區服務，會常常主動關心教友，了解教友的需要。其中，三姊妹跟修女們的關係比較密切，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修女替她們處理了不少生活上的難題。Connie 說：

修女都好好的。我們認識的修女有外國人，有中國人。我最深印象的是其中有幾位中國人，是好好的。一位是余修女，一位貝修女，還有一位雙眼很大的，外國人來的，她「眼碌碌」⁹令我很害怕，不過也是很好人的，她的廣東話很好。

⁸ 躲起來的意思。

⁹ 眼睛睜得很大。

最慶幸的是，我們搬來觀塘，爸爸媽媽請余修女和神父，寫了封信，我們便到聖神小學讀書。我們是插班的，弟弟讀一年班，我讀二年班，她（Judy）在十八座（即F座）天台讀幼稚園，有個弟弟還未出世。而且修女每個月幫Judy交學費，她讀中一的時候，每個月給五十元左右。

Judy回應說：

我讀中學時，媽媽說沒錢讓我讀，是教會資助我的。但我又不是讀書的材料，真的不好意思呢。

問到三姊妹有沒有想過做修女，她們異口同聲答「沒有」。Judy說：

我們覺得，修女和神父要讀很多書，我們覺得他們「好叻」。

